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喻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瞿超

副主任 魏晓蕾 朱杰 陈童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任世红 陈思 吴元庆 张吉林

张刚强 张美云 张思东 傅佩丽

主编 魏晓蕾

副主编 陈思

目 录

2020年 第3期 总第125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 辑 出 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责 任 编 辑:宋 好 鲍跃华 龚万达

本刊特稿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拓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要思想论述 / 杨卫敏 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八大以来国内关于习近平最大公约数重要论述研究述评 / 言浩杰 17

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的话语演进及其时代意义

——基于建国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的文本考察 / 黎锐楷 24

统战理论与实践

加强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建设初探 / 马中红 刘泽宇 胡思洁 31

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三点”论

——基于调研基础上的亮点、难点以及着力点分析 / 姚跃传 38

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的产权法治保障 / 马弋涵 秦国伟 43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电子邮箱:jssyxh@163.com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艺中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 年 6 月 28 日
定 价:8.00 元

民族与宗教

- 论新时代宗教工作创新推进的三个维度 / 李岁科 50

以瑶族文化重塑助推瑶族地区乡村振兴探析

- 基于广西贺州的调查 / 龚 晨 56

中华文化

- 社会主义学院语境中的“中华文化”属性剖释 / 龚万达 62

- 梁漱溟“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 季良琴 67

- 庄子亲情伦理思想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 / 毛 笛 73

学习与思考

- 浅谈“新冠”疫情影响下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 曲 超 78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3 * 2020 - 06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拓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要思想论述

杨卫敏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开启了理论新境界和工作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就知识分子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和人才工作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理论,为做好新形势下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着眼“两个一百年”目标,要从战略性、全局性、开创性、基础性等方面,系统理解、深刻领悟开展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进而全面准确把握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目标要求、方针政策和着力重点。要加强工作思路谋划和实现路径探索,正确处理守正与创新、统筹与分类、上层与基层、线上与线下、公转与自转等关系,讲求方法论,提升科学化水平,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形成架构完善、覆盖全面、体系健全、机制灵活、功能有效的社会化的党外知识分子大统战工作格局。

关键词: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04-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就知识分子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和人才工作方针政策并形成了战略思维^[1],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理论,为做好新形势下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相关章节,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办国办以及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统战部联合其他部门出台的相关文件,对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出国

和归国留学人员工作、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地位、时代特征、方针政策、方式方法、机制渠道等作出了一揽子开创性的谋划和规定,并在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实践创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开启了理论新境界和工作新局面。

一、如何全面看待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必须处理

收稿日期:2020-05-12

作者简介:杨卫敏,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非公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浙江)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专家组成员,浙江省政协特约研究员。

的一个重大课题”。“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历程,可以看出,什么时候处理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处理不好,党和人民事业就容易遭受挫折”。^⑨进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各类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党外知识分子占较高比例,体制外党外知识分子不断增长,且越来越往基层和各类新业态、新组织和新群体中集聚。党外知识分子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特殊群体,既是各领域的知识精英和专业人才,又是统一战线代表人士的重要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战略性基础性工作。”^⑩着眼“两个一百年”目标,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一) 战略性: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事关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利于凝聚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人才流动日益强化,人才争夺日趋激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人才工作抓好,让人才事业兴旺起来,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⑪强调“留学人员工作是党和国家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要竭力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留学归国人员为国服务”。^⑫“要按照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把做好留学人员工作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⑬特别是这次疫情蔓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很可能成为改变国际力量对比、重塑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既给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才工作造成严重影响,也给我国加快科技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打造全球投资避风港和人才蓄水池、加快海外投资并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地位等带来新的机遇。这就要求统战工作必须鼓励和支持党外知识分子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群策群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新技术的应用、新兴产业与业态的引领,抓住全球经济与产业链面临重组之机,实现“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

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担当。

(二) 全局性: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党外知识分子有着各方面的专业特长,而其中体制外新阶层人士又具有联系广泛、身份超脱等优势。无论是治国理念的落实还是执政方略的实施,都需要发挥党外知识分子重要作用,党外知识分子群体是建设治理共同体、提升治理效能、彰显中国制度优势和中国智慧不可或缺的重要智慧和积极力量。

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和社会稳定,离不开党外知识分子的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⑭意识形态安全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事关国家政治安全和党的执政安全。党外知识分子所处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两新组织”、民营(含港澳台侨外资)企业、网络新媒体等,是各种思潮和思想观点的交汇地,在意识形态领域起着桥头堡和晴雨表的作用。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比较活跃,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教师和网络人士,其思想状况直接影响着学生和网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事关为社会进步凝聚价值共识,引导党外知识分子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是统一战线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思想政治领域稳定的责任所在。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离不开党外知识分子的参与。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当前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外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好建言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可以促进党和政府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在体现制

度效能中发挥积极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打造法治营商环境，推动行业和专业领域发展，需要“两新组织”特别是社会组织、中介组织积极对接，需要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参与。大力开展基层协商民主，促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需要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内各方面人才的参与。

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和宗教中国化方向，离不开党外知识分子的参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是一个较大的群体，包括学术、文化、艺术、技术、宗教等各个领域，他们思想活跃、能量不小，要纳入工作视野、加强引导，发挥他们的作用。”^[8]实现乡村振兴特别是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需要党外知识分子的参与，而其中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作为本民族中专业和知识精英，可以从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要着力“培养一支政治上跟党走、自觉认同中华民族精神、学识上有造诣、工作上有实绩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9]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关键是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代表人士，而其中“宗教上有造诣”就是要有宗教学识素养和理论水平，与党外知识分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特别是当前在高校民族和宗教工作任务加重的情况下，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在促进民族团结、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境内外“三种势力”思想传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

坚持“一国两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离不开党外知识分子的参与。当前，台湾人才外流趋势正在加强，加快引进台湾人才、促进高端人才集聚面临难得的机遇。党外知识分子社会联系面广，社会活动范围宽，不少党外知识分子与港澳台地区和华人有着各种联系和交往。特别是随着港澳台与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来内地就读、就业、创业、交流合作的港澳台青年越来越多，这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阶层专业人士参与港澳台青年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契机和渠道。

开展民间外交、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党外

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发挥归国留学人员的优势融通中外，推动中外交流合作的开展。鼓励支持党外知识分子参加海外华文教育，传播中华文化。借力“以才引才、以才聚才”的链式效应，引进外籍知名专家，通过文化交流、寻求文化共识，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要通过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特别是归国留学人员和新阶层专业人士在对外交往交流合作中的独特作用，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文化理念的理解和认同，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建设贡献力量。

(三)开创性：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有利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党外知识分子规模和种类不断增长，工作范围从传统的“一外”（党外）扩展为“三外”（党外、体制外、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加剧和深化，体制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断出现新的职业、新的群体，已成为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的多数。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而团结在党的周围，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同时面临的重大新课题。^[10]

当前，党外知识分子呈现以下鲜明的时代特征：高学历、年轻化趋势明显，多数具有专业优势和国际视野；利益格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越来越多元多样；联系广泛、社会影响力增强；政治触觉敏锐，需求诉求增强；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凸显。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可以为我们党长期执政凝聚人心，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留学人员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要鼓励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家服务”。^[11]当前，我国留学人员出现了回国高潮，这给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留学归国人员具有群体年轻化、专业前沿化、思维国际化、择业多元化、思想多样化等显著特点，在自主创业、企业接班、政府部门、科教文卫、网络媒体等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对新时代统战工作

的方式方法、平台渠道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要求“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12]。这意味着新时代统一战线已从传统的海内外“两个范围的联盟”扩展为“三个范围的联盟”^[13]，为做好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做好网络统战工作，是新形势下统一战线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是统一战线积极发挥优势，整合政治资源，争取网络舆 意民意，参与网络虚拟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是顺应统战工作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

(四)基础性：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事关统一战线各领域代表人士后继有人，有利于强化新时代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的基础保证

党外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各领域代表人士的重要源头，涵盖统一战线五大关系各个领域，是各方面(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归国留学人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和新生代民营企业家、港澳台青年等)代表人士的水源地。当前，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如：无党派人士的认定工作相对滞后，不同程度存在人才储备不够充足、培养路径不太明晰、政治安排有待继续拓宽等问题；留学人员组织建设有待健全完善；外企管理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队伍群体的统战工作尚未完全破题，工作基础相对薄弱，缺少有效沟通渠道和引导培养方式。特别是新形势下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有待加强。

高校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重要来源，做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事关推进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可持续发展。随着高校规模不断扩大，人员构成日趋复杂，高校统战对象呈现新的特点，可以说，高校统战对象种类多、人数多、情况复杂、工作任务繁重。面对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高校统战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各方面党外代表人士储备不足，尤其是旗帜性人物后继乏人；方式方法有待改进，不同程度上存在只抓业务不抓思想(或针对性有效性不强)、只看能力不看

立场的问题；党外干部的培养机制不健全，尤其缺少实践锻炼的机会，党外人士的综合能力在群众中的认可度受限；工作体制和机构设置、工作力量不到位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青年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代表人士实现新老交接和后继有人的组织保证。党外知识分子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海外归国留学人员以年轻人为多，要积极探索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分众统战模式，切实提高新兴群体统战工作精细化科学化水平。近年来，作为社会组织中党外人士最集聚、成员需求最多样、活动开展最活跃、动员机制最灵活的青年社会组织得到快速发展，为做好青年党外知识分子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要适应青年党外知识分子以分群结社形式大量汇集于社会组织的趋势，因势利导依托社会组织采取分群体搭建统战平台、分层面构建统战机制、分众化开展服务引导的工作方式，积极探索青年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新模式，不断从自身发展、组织建设、社会实践上引领党外青年的发展方向。

二、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着力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人民事业要不断发展，就要把各方面人才更好使用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等各方面优秀人才吸引过来、凝聚起来，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14]这一段精辟论述高度概括了新时代党关于知识分子(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总体目标、工作思路和实现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充分尊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战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工作。一是高度评价知识分子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 90 多年的历程中，广大知识分子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15]高度肯定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是国家的宝贵财富”^[16]。二是强调要坚决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并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方针”^[17]。三是强调对知识分子要“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1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任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前提，必须坚持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敢于把知识分子放在重要岗位上，真正使他们有用武之地。为知识分子营造良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使他们成长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19]四是“以政策留人、以感情留人、以事业留人”^[20]。强调要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落实好相关政策，激发他们的创新创业积极性。

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1]。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2]。这两种提法，从本质上说都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可，特别是后一种更使知识分子的政治、工作和社会地位有了根本提高。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两种提法都没有专门涉及党外知识分子的性质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回国服务还是为国服务，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建设者，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中华民族复兴的爱国者，都是党执政的重要依靠力量和团结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尊重和包容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定的对党外知识分子“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充分尊重”，而

且贯穿于思想引领、信任使用、政治吸纳各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政治上关心他们成长，加大培养使用力度。使用是最大的尊重，要让英雄有用武之地，敢于把优秀党外知识分子放在重要岗位上，担任科研、教学、医疗卫生、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领军人物，担任领导干部特别优秀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要充分尊重党外领导干部履职，有职有权有责，让他们在其位主其事负其责，充分尊重其分管范围内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要充分听取相关领域党外知识分子的意见建议，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对（党外）知识分子要“注重上在政治上吸纳，既把优秀的知识分子培养吸收入党”^[23]，又注意把一部分优秀的党外知识分子留在党外或推荐给民主党派组织。

党外知识分子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要体现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归国留学人员在价值准则、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回国后往往有个适应和融入期。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留学人员反映比较多的问题是回国后适应国情难。要针对这方面的突出问题，采取适合他们特点的方式方法，加强教育引导，体现热情关怀，帮助他们增进对国情的认知，把所学知识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发挥留学报国传统。在具体实践中，一些高校遵照这一方针政策，针对留学归国人员面临“三不”（不熟悉环境、不了解政策、不知该做什么）、“三难”（实验室建设难、申请项目难、招生难）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工作，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促进了海归人员融合发展。

（二）广泛凝聚

通过对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凝聚政治共识，凝聚智慧力量，引导、鼓励和支持他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聪明才智、展现懿德嘉行。

一是加强政治引领。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正确理解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本质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做党长期执政的坚定支持

者。引导他们从内心深处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以及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把牢政治方向。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提高政治把握力和鉴别力,敢于旗帜鲜明讲政治。引导党外知识分子通过讲坛论坛、学术交流、著书立说、文艺创作、媒体发声等多种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要为党外知识分子在各种思潮交锋中正面发声创造条件、提供支持,推动实施正能量网络“大V”培养工程。要丰富思想政治工作抓手,经常同各类党外知识分子广泛开展谈心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意愿诉求和意见建议,进一步增进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

二是加强事业引导。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24]。要用中国梦引领人才梦,用人才梦托起中国梦,引导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把个人理想和事业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中,胸怀大局、心有大我,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发展中,立足本职建功,积极建言献策,开展社会服务,贡献智慧力量。广大党外知识分子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统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个人成长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进一步激发主人翁意识,在教学、科研、生产、创作、管理一线深耕细作、创造业绩。

三是加强价值引导。习近平总书记把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对广大知识分子的第一位要求。^[25]要引导党外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一代坚决抵制西方“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要坚持以文化人,“自觉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浸润党外知识分子,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主动融入知识传播、文艺创作、科技创新、生产创造之中。要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特别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和新时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和感人事迹,引导支持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

极传递正能量,做良好社会风尚的示范引领者;崇尚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遵守法律规章、公序良俗,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践行者;彰显至诚报国的时代担当,激发创新创造热情,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不懈奋斗者。

(三)发挥作用

要引导和支持知识分子在创新创业中发挥优势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关键在于用得好、留得住,真正把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凝聚起来、作用发挥出来。^[26]各级党委政府积极为党外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创造条件,激发活力,把党外知识分子和各方面人才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一要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智库”作用。为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搭建平台,畅通协商议政渠道。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关注时事民生,聚焦发展热点,围绕中心工作,倾民声、汇民意、达民情。积极创造知情出力创造条件,及时通报情况、解读政策、回应问题,鼓励支持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专业优势,深入调查研究,建诤言、献良策、出实招,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才智。高校党组织要支持党外人士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教育改革发展献计出力。要把党外知识分子的重要议政建言成果逐步纳入个人业绩的考核评价,不断提高建言能力和献策水平。

二要优化党外知识分子创新创业环境。引导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紧紧围绕增强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加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更多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成果,努力做科技创新的时代先锋。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海归人才在商业模式、商业实践等方面的优势在不断削弱。当前海归人才的创业创新环境需进一步优化,要在制度层面上以及在法律落实层面上保护创新行为。要加强对“海归企业”的培育扶持,探索建立创业启动基金、创业孵化基金和企业创新基金,营造平等竞争的学术环境和积极向上的工作环境,采取“政府扶持,企业主导”的模式,通过落实政策、整合资源、完善服务等方式助力海归人士完成创

业梦想。特别注重发挥海归人士与本土民营企业在产业升级中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各方面优势互补,建立共同的长远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做好“民资”与“海智”之间的牵线搭桥工作,建立“项目超市”等海外人才与民营资本对接网络平台,精准有效实现海归人才服务与企业需求“齿轮吻合”。加大对各类自由择业青年知识分子创客的创业创新扶持力度,探索推广“政府+企业”搭建创梦新平台、“基金+项目”激发逐梦新动力、“导师+管家”开辟助梦新渠道,为青年“创客”筑巢逐梦提供创业孵化平台。创新金融产品,探索创业创新知识贷等做法,使“知本”变“资本”,给予初次创业、自谋择业的知识分子资金支持。发挥以智引智酵母作用,逐步形成以才引才、项目用才、创业留才的生动局面。

三要发挥各领域各方面党外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综合优势作用。围绕中心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围绕智力优势开展专业服务,围绕社会责任实施公益帮困。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党外院士服务团、律师服务团、留学人员服务团等,引导党外知识分子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提供决策咨询、技术培训、法律援助、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在深入基层、了解实践中更加全面地发展。支持党外知识分子在“请进来”“走出去”工作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开展对港澳台和对外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为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献计出力,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要引导支持党外知识分子用好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自觉成为舆论正能量的传递者和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要发挥各领域各方面党外知识分子在应对化解突发事件中的综合优势,协助党和政府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做好境内外涉侨疫情、舆情应对等工作。

(四)体谅包容

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的缺点和问题,在坚持底线原则和加强思想引领基础上要多包涵宽容。党外知识分子广泛分布于体制内外,数量庞大、作用独特,普遍思想活跃、个性特点比较

鲜明,对社会思想舆论有较大影响力。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由于其体制外自由择业和海外接受教育的特点,其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多元多样,有着较强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性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他们打交道,应当多尊重和包容,多看他们的主要方面,多看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做到容人之异、容人之短、容人之失。对此我们要全面理解、精准领悟、正确把握。

一是在加强沟通中实现“包容”。对于党外知识分子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很难在短期内解决消弭的问题,要尽量沟通、减少分歧。在沟通过程中,做到容人有量、容人有度,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多开展面对面的谈话谈心,加强心连心的交流探讨,了解掌握真实想法,妥善回应思想困惑,以竭诚支持和真情关爱赢得信任,增进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针对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的特殊情况,建立党外归国留学人员协商对话与政治沟通机制,用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党外归国留学人员,让他们表达利益诉求,表达不同观点和意见,在沟通交流中求同存异、增进共识,并实现党外归国留学人员的合理诉求。通过有序政治引导,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

二是创新培育中实现“包容”。通过培育代表人士,以“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中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红、灰、黑”三个地带^[27],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互联网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当前要加大正能量网络“大 V”培养力度,着力在触网懂网的党外知识分子中推出一批政治上靠得住、专业上过得硬、社会上有影响的“网络红人”,壮大正面舆论引导的网络骨干力量。同时通过积极有效的工作,争取灰色地带、缩小黑色地带。加强团结争取和依法管理工作,支持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行业规范,切实加强网络综合治理和网络人士管理工作。区分不同立场倾向,重视对有争取空间的网络人士的教育引导工作,开列重点对象名单,制

定个性化工作方案，有针对性地做好团结争取工作，建立约谈制度，对苗头性问题及时提醒引导。

三是在强化法治理念中实现“包容”。通过组织开展调研、考察、挂职等活动，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在实践锻炼中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增进政治共识。加大对党外青年教师和海归教师的培训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史与国情教育、学术安全、国家安全和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运用法治思维观察分析解决问题，增强对外部渗透的抵御能力和依法自我保护能力。强化廉洁教育和道德要求，发挥法治的警示、约束和教育作用。

四是通过个性化工作方式实现“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做有个性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即使对那些政治倾向有问题的，也要建立联系渠道，采取个性化的方法，只要在基本政治立场上没有大问题，越是难做的对象越要去做。掌握这一方针政策，关键是要审时度势、严宽适度，增进一致性而不强求一律，包容多样性而不弱化主导。要抓住关键、强化引领，对个别有模糊认识和错误倾向的人员，要采取个性化的方法，一对一、人对人、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地开展教育引导工作。使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的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当下的共识底线和最大的价值自觉、政治自觉。

三、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要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队伍呈现规模不断扩大、构成日益复杂、思想更趋多元的新特点。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针，讲求方法论、提升科学化水平，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守正与创新

“守正”就是坚持和发扬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创新”就是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需要，不断探索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平台、渠道和方式方法。“守正”才能确保“创新”不走偏，创新是为了更有效地“守正”。

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把党的领导作为“主心骨”、“硬要求”、“方向盘”。要切实发挥党组织主体作用，强化思想引领，着力凝聚政治共识。但同时必须明确：做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贵在入脑入心，亦难在入脑入心。进入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呈现出许多新变化和新特点，构成更加多样，分布的行业和领域更加宽泛，思想更加活跃，自主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要切实增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要进一步把工作做“大”做“活”。全面落实新举措，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履职能力、制度作风建设，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高质量发展。盘活工作机制，提升活动的多元性、丰富性。要积极在新产业、新业态等领域建立知联会等组织，丰富人才结构，凝聚更多各类知识分子。

二要进一步探索平台和载体建设。搭建好党外知识分子培训提升、实践锻炼、创新创业、议政建言和宣传引导等工作平台。抓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总结推广各地在基层治理、创业创新、社会服务、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作用的经典案例，进一步提升实践创新基地影响力。规范拓展深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系统谋划，推动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沿着规范化、常态化、特色化方向发展。

三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渠道和方式方法。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更有效地把他们组织起来。继续探索与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的合作方式和社会化工作途径，借助新的信息技术手段掌握思想动态、做好舆情分析，创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探索更加有效的工作模式。要强化互联网统战思维做好思想政治引导，更加注重新时代思想政治工

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二)统筹与分类

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一贯一视同仁,不因政治面貌、体制不同、有无海外经历而对其看法有所不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是一体的,没有专门的党外知识分子政策。^[28]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现在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更加多样,需要针对不同特点分类施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队伍呈现规模不断扩大、构成日益复杂、思想更趋多元的新特点,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创新方法路径,科学分类施策,统筹兼顾各方,切实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升工作科学化水平。

一是在坚持共性要求基础上分类分层明确各领域党外知识分子的着力重点。国家机关重在提高政治把握、合作共事、履职担当能力;高等学校重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科研院所重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进理论、制度、文化、科技等创新;国有企业重在激发爱岗敬业精神,致力企业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民营经济组织、社会组织重在增强政治认同感和向心力,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坚持以代表人士为工作重点,对业绩突出、群众认同度高的党外知识分子,要加强政治历练,提升综合素质,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对有影响有个性的党外知识分子,要畅通联系渠道,设计小切口渠道,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努力化解消极因素。对青年党外知识分子,要及早纳入工作视野,助力成长成才。要采取多种措施夯实广大党外知识分子与党同心同德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是在把握党外知识分子总体特征基础上积极探索特殊群体的“分众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党外知识分子开展工作要采取个性化办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是党外知识分子,但与体制内党外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关键是要在理念、方式、载体等方面探索创新,中办 2017 年《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研究和把握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成长规律”。归国留学人员视野比较开阔,但也有一些

人存在对国情了解不够等问题,要推动他们实现“再本土化”,增进对国情、社情、民情的了解,帮助他们解决在适应国内环境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发挥专长,干成事业。与此同时,要大力培育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和特殊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主要是年轻人的事业,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29]。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党外知识分子群体,深入调研,摸清底数,切实掌握党外知识分子所思所需,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保障工作做到位,做出成效。

三是在推进党外知识分子代表队伍建设工作中,注重强化无党派人士队伍结构化培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党派人士主体是知识分子”^[30]。从某种意义上讲,无党派人士是知识分子代表人士中的代表人士,是党外知识分子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但目前高层次的旗帜性的无党派代表人士数量还不多并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与此同时,相比民主党派而言无党派人士不具有专门组织,其社团身份或专业身份往往强于其政治身份。探索开展无党派人士队伍结构化建设工作,能为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提供更为有效的载体、抓手,为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引领、培养选拔和作用发挥提供更好的平台。要分类建组,健全无党派人士队伍结构框架;分类施策,发挥无党派人士优势特长;分级建库,加强无党派人士有序管理。特别是要注重适合不同个性特长,分别培育岗位专业型、参政议政型、社会服务型、组织管理型的无党派代表人士。要以队伍建设为重点,增进身份认同,促进作用发挥。

总之,无论是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分类施策”还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中的“分众统战”^[31],都是有分有合、统分结合,该分的时候分,该统的时候统。分是为了增强工作针对性、有效性,统是为了形成工作合力,其目标都是为了进一步把工作做出成效。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不同需求精准施策。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还创出了“四分

法”、“三统法”^[32],囿于篇幅此处不作详述。

(三)上层与基层

统战工作主要是做代表人士的工作,党外知识分子领域统战工作也不例外。传统的体制内党外代表人士主要是上层人士,而随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海外归国留学人士的大量涌现,行业(专业)领军人物、网络意见领袖乃至一些基层草根社会组织代表,也必然进入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的工作视野。因此,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建设,必须注重体制内上层代表人士物色培养与体制外新的社会阶层“列名”制度并重,同时还要注重青年知识分子、海外归国留学人员中的代表人士培育。

一是着力建立党外知识分子物色储备工作长效机制。注重通过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发现人才,通过团体组织推荐人才,通过各类活动物色人才。要将党外知识分子队伍建设纳入高校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工作的总体规划。根据党外代表人士宽推荐、严把关的要求,要善于运用大数据,建立一套梯次化数据库。加强青年党外知识分子的培养,通过各种联谊组织、服务团等平台做好中青年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的物色和培养工作,支持他们不断增强在各自领域中的影响力,促进党外年轻干部成长成才。

二是着力推进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列名”制度。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综合评价,全面掌握和了解重点对象的现实表现,逐步形成一支具有较高素质、富有时代特征、与党亲密合作并为本阶层所公认的代表人士队伍。发挥其在社会政治生活和专门行业领域中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的能力和作用,有意识地培养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领军人物。加强网络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建立分级分类人物库,重点打造新媒体人、党外网络评论、网络宣传三支队伍。抓头部名人,促示范引领,实施正能量“大V”管理培养工程。

三是着力加强对党外归国留学人员的培训和使用。引导归国留学人员熟悉国情,融入社会,强化法治意识,自觉履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行业

和单位的先进,在专业领域和工作生活中发挥带头、引领和示范作用。在此基础上积极培养和使用一支专业造诣深、思想意识靠得住、综合素质好、年龄结构合理、影响广泛的党外归国留学人员。

四是着力建立无党派人士输出机制,有针对性地加强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探索建立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的培养、锻炼、交流平台,畅通国家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以及“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之间的交流渠道,培养更多有影响力、号召力的党外知识分子和无党派人士领军人物。要加强安排使用,盘活党外人士资源,特别要积极举荐他们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特邀人员等,具备能力、符合条件的要担任实职。

(四)线上与线下

“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新媒体人士工作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各个群体的统战工作。

一是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思想引领工作。着眼新时代统战工作任务要求和网络人士特点,适应互联网发展规律,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传统优势,注重运用网络思维和技术手段,创新工作理念、机制载体、话语体系和方式方法。统战干部要增强互联网思维,提高知网、懂网、用网能力,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与此同时,统战工作形成的登门走访、座谈联谊等线下的统战工作方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要坚持运用好。有些线上的问题要在线下解决,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引导工作,避免复杂敏感问题被蓄意炒热。要把网上的舆论引导和网下的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做到网上有声音、网下有举措,既会“键对键”又能“面对面”,切实增强工作实效。

二是要重点加强网络人士思想引导。网络人士是在舆论传播、内容生产、社会动员等方面具有较大影响的群体和人员,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引领和团结引导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要了解掌握网络人士思想动态,及时研究网络人士思想

动态和利益诉求。特别是针对网络人士以青年为主体的特点,创新教育活动形式。要把加强思想工作与做好关心帮助结合起来,经常了解关心网络人士的实际情况,及时反映其合理诉求。要建立健全部门间沟通协商机制,推动相关部门在职业发展、知识产权等方面保障网络人士的合法权益,优化发展环境。要支持网络人士正向引导网络舆论,发挥网络人士建言资政作用,为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网络人士议政建言、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遴选政治素质好、专业水平高、建言能力强的网络人士,组建“网络人士智库”,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引导和支持网络人士助力经济发展,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特别是在促进应对疫情、化危为机、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打造网络统战工作平台载体。着眼于构建最广泛的网上统一战线,充分利用“两微一端”、音视频等各种网络技术平台和手段,大力加强网络阵地建设。要精心研究网络议题设置,善用网言网语引导网络人士正确认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要探索建立网络人士联谊组织,打造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活动品牌,打造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创新示范点。要促进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向网络统战工作转型,推进“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

(五)公转与自转

“人尽其才与培育引领的辩证统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知识分子工作战略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33]由于党外知识分子往往具有较强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性格,又具有专长特长,思路前沿开阔,思维新颖敏捷,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必须要处理好“抓”与“放”的关系。^[34]要明确党委及统战部门主抓思想引领、组织帮扶、代表人士培养,其他诸如活动创意、载体建设、社会服务等注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要善于借力聚力,激发活力,事半功倍,切忌包办代替,引发逆反心理,事倍功半。

一是坚持将思想政治引领融入日常,努力实现自主、自觉、自为。要着眼党外知识分子自我教

育、自我引导、自我实现,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大局、融入业务、融入生活,围绕重大战略部署、重大行动计划、重大工程安排、重大科研项目实施,要着力激发党外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意识。国有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要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检查,将思想政治要求寓于行业准入、从业规范、职业道德中,在项目申报、职称评聘、荣誉奖励等方面坚持党内党外一视同仁。

二是加强各特色队伍的自转、公转和联转,跨队伍整合资源形成叠加效应。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往往关心自身发展以及与其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价值取向较为务实,要通过引导自主建立职业经理人联谊会等渠道开展日常联系工作。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结构复杂、特长明显、思想和生活独立自由、参政意愿不强,一方面要利用所在社区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按照“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规律,以行业相近的原则引导他们分门别类建立行业联谊小组。要进一步吸纳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代表人士进入网联会,加强网联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营造清净和谐的网络环境。

三是加强知联会等统战性知识分子社团的规范化建设,把握发挥好台前幕后和桥梁纽带的作用。用好欧美同学会这个组织平台,进一步发挥留学报国人才库、建言献策智囊团、民间外交生力军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发挥群众性、高知性、统战性的特点和优势,立足国内、开拓海外,努力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把广大留学人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35]。知联会、新联会、网联会、留联会、欧美同学会、中华职教社等社团,是我们党开展各类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平台载体,要不断优化和完善组织架构、体制机制和功能作用,强化这些组织的主体作用,将其推上前台,统战部退

居幕后。在巩固扩大原有阵地基础上,要统筹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载体建设,积极探索向新经济组织、新业态、新社会组织和海归留学人员拓展,彰显“成长、建言、创新、协同、服务”五大功能。

四是要充分发挥各类自组织的作用,拓展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触角和功能。当前各类自组织方兴未艾,其中大多是新的社会阶层和青年自组织。要积极探索高校青年自组织、体制外各类青年自组织的工作,努力实现自组织的他组织和再组织。特别是要通过打造枢纽(联合)式青年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平台,实现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与青年统战工作、社会治理创新的共融互促,改变单一依托行政动员的传统统战模式。要通过自组织统战工作,链接一批与新社会组织和民间草根社团,吸纳一批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多元化的青年利益群体,使统战和青年工作的功能触角有效地向社团和社群延伸覆盖,使广大青年成为地方党委政府施政治理可依靠的对象。

四、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知识分子和人才工作是党的全局工作,全党都应来抓”^[36]。同时他强调,“全社会都要关心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37]。特别是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涉及党内外、体制内外、海内外,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各方面齐抓共管,形成架构完善、覆盖全面、体系健全、机制灵活、功能有效社会化党外知识分子大统战工作格局。

(一)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党政领导要与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

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应当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要加强和改进领导方式,讲求领导科学和艺术,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努力实现管得住、管得好,最大限度地把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政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到知识分子中去,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38]。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多关心、多交流、多鼓

励,做党外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要进一步健全联谊交友制度,把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干部队伍建设总体规划,为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深入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组织保证。要探索党员骨干与党外知识分子分层结对交友,沟通思想、增进共识。要充分认识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把握工作节奏,避免急于求成。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高校统战工作的领导,上级统战部门、教育工作部门要加强对高校统战工作的指导支持,高校党委要强化统战工作主体责任,加强高校统战工作队伍建设。

(二)健全组织工作体系,拓展社会化工作网络

推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党政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基层单位具体落实、党派团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党外知识分子大统战工作格局。统战部要就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着力加强代表人士思想引导,发挥好参谋组织、协调、督促的作用。国家机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单位要发挥主阵地作用,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工作有人负责、有效开展。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等群众团体要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组织吸纳和思想引领。要推动民主党派加大对各自成员思想引导力度,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职责和各自章程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留学归国人员的工作。知联会、留学联合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网联会、欧美同学会、中华职教社等统战团体,要按照抓组织覆盖、抓骨干成员、抓品牌活动、抓规章制度的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激发内在活力。要善于借力,发挥行业协会、学术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和青年、网络自组织的作用,延伸工作手臂,拓展工作网络,形成工作合力。

(三)建立完善长效机制,促进规范科学有效运转

建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织

协调机制、成长成才机制、考核评价机制、谈心交流制度、舆情防控预警研判制度、归口管理制度等,不断提高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健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机制,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责任分工,纪委、组织、宣传、统战、网信等部门加强协调。抓基层基础,促保障有力,将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者纳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网络生态工程等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规划,实施联合培养。建立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年度调研机制、思想研判机制、协调联动机制、督促检查机制。不断完善党外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机制,形成职责明确、载体健全、运转高效的党外归国留学人员工作体制机制。探索地校融合抓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联合开展学习培训、参政议政、课题调研、社会服务、联谊交友、工作协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参考文献:

- [1][26][28][33] 杨卫敏.论习近平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战略思维[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3).
- [2][3][11]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N].人民日报,2015-05-21(01).
- [4] 习近平. 民族振兴靠人才 [EB/OL].(2013-08-30).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29/c64094-22737991.html>.
- [5][35]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13 年 10 月 21 日)[N].光明日报,2013-10-22(02).
- [6] 习近平强调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EB/OL].(2013-10-22). <http://edu.163.com/13/1022/09/9BPGRP1000294IIH.html>.
- [7] 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人民日报,2013-08-19(01).
- [8][9] 新华网.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EB/OL].(2014-09-29)[2017-05-10].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9/c_1112683008.htm.
- [10] 杨卫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新时代党的建设全新课题[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6).
- [12] 习近平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04-22(01).
- [13] 杨卫敏.论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战略思维[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1).
- [1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 年 7 月 1 日)[N].人民日报,2016-07-02(02).
- [15][16][25][30][37] 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EB/OL].(2017-03-0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lh/2017-03/04/c_1120569212_2.htm.
- [1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 [N].人民日报,2013-10-02(01).
- [18]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1(02).
- [19][38]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精彩论述摘编 [EB/OL].(2014-08-19).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19/c164113-25493994.html>.
- [20]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5-10-15(02).
- [21]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88.
- [2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89.
- [23]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21(01).
- [24] 习近平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N].人民日报,2017-05-26(01).
- [27] 杨卫敏.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宣传思想工作:机遇、挑战和对策[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5).
- [29]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N].人民日报,2014-02-28(01).
- [31] 杨卫敏,许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众统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3).
- [32] 杨卫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中的“分”与“统”——基于浙江省各地的探索研究[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2).
- [34] 杨卫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与新时代统一战线创新拓展[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报,2020(2).
- [36]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30 日)[N].人民日报,2016-06-01(02).

责任编辑:宋好

十八大以来国内关于习近平最大公约数重要论述研究述评

言浩杰

摘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国内学界围绕“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作了相关学术探讨,就其基本内涵和特征、生成逻辑、功能和价值、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深入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需进一步界定其科学内涵,系统挖掘其生成的历史文化、理论及其实践资源,拓宽其功能和价值研究,不断推进研究方法的升级和学科视角的创新。

关键词:最大公约数;统一战线;核心价值观;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17-07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最大公约数”。如“推进改革过程中,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1],“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2],“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3]。最大公约数已从最初的数学名词上升为党的治国理念,并逐步转化为一种政治话语,引发学术界的研究和关注热潮。当前国内学界对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进行了多维度探索和研究,本文旨在对学界关注热点进行综合归纳的基础上,总结优秀研

究经验,探索未来研究方向。

一、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研究的基本概况

文献数量和文献研究的关键词是反映某领域研究现状的重要参数。通过对年度文献数量的分析,能反映出研究热度的高低。通过对关键词的解析,能映射出研究的聚焦点。

(一)年度文献的数量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分析研判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以“最大公约数”为主题,并且全文包含“习近平”进行文献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 2012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果显

收稿日期:2020-05-21

作者简介:言浩杰,盐城师范学院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法政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盐城市政府社科奖励基金项目“基层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研究”(编号:20szfsk39)研究成果。

示(图 1):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研究的文献为 201 篇,文献数量明显增加,表明国内学者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度正在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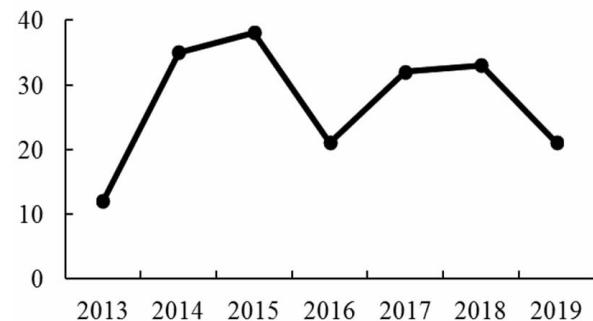


图 1 年度出版文献的篇数走向

(二)文献关键词解析

关键词在一篇文章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最为凝练地提取了作者的核心观点,能够较为集中地反映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是 CiteSpace 软件的一个重要分析对象。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研究对象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设置时间跨度为 2013—2019,单个时间分区长度为 1 年,提取每个时区中被引频次最高的 10 个关键词,得到国内最大公约数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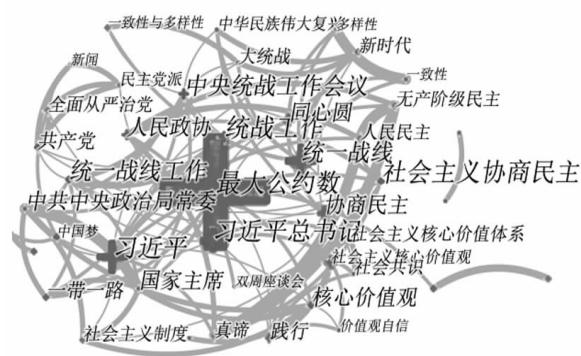


图 2 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

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整个关键词网络整体上是紧密的,表明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较强。“最大公约数”位于图谱的中心,与“习近平”、“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政协”、“中国梦”、“一带一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表 1)等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密切,构成了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研究的主要

内容和热点走向。

表 1 最大公约数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前 20)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最大公约数	62	11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4
2	习近平	31	12	践行	4
3	统一战线	19	13	统一战线工作	4
4	协商民主	10	14	一带一路	3
5	统战工作	8	15	全面深化改革	3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16	新时代	3
7	人民政协	6	17	核心价值观	3
8	同心圆	6	18	全面从严治党	2
9	中国梦	5	19	共产党	2
10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4	20	真谛	2

二、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基本内涵

围绕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基本内涵,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阐述,观点如下:

(一)“共识论”

有学者认为最大公约数就是最大的共识,这种共识表现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学者杨卫敏表示:“最大公约数理念在面对利益格局多元、价值取向多样时,务必最大限度寻求利益共同点和共同价值观。”^[4]杨建义教授深化了价值共识的理解,他认为最大公约数是“群体之间、个体之间,以及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价值交集,能够有效发挥价值的整合功能,克服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分歧,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社会所认同,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性”^[5]。

(二)“平衡论”

汪涛等人从经济学的视角阐释最大公约数的基本内涵,他们认为最大公约数“既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调,也是不同改革事项之间的统筹。最终都是为了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体现利益均衡”^[6]。有的学者从生态的视角揭示最大公约数的含义,他们认为生态与发展是时下中国的主题词,为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为现实,就需要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大

公约数，这一最大公约数即控制、保护与生存、发展之间的平衡^[7]。

（三）“统一说”

杨颖教授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探索最大公约数的内涵，认为执政党不仅需要摸索和探求全社会意愿的交集，还需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维护最广泛的群众权益进程中不断发挥主导作用，最终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意愿和利益的统一。^[8]王树臣教授认为最大公约数思想意味着“同和异的统一”，其具有同和异相融合的特质，同和异相包容的本质以及同和异相兼容的精神。^[9]

三、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生成逻辑

重大的理论问题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最大公约数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一）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历史逻辑

寻求最大公约数具有深刻的历史积淀，在不同领域都有所体现。有学者认为在寻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最大公约数中，就具备深刻的历史基础。杨建义教授表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内核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精神实质已经深刻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所秉持和践行的价值取向、价值规范和价值原则”^[10]。学者李克认为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最佳体现是统一战线理论。他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一项富有创新的制度安排。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进了事业发展。”^[11]

（二）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凝聚民心”思想是最大公约数思想的文化基础

有学者表示，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流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政治思想，这是执政者努力寻找凝聚社会民意最大公约数的办法^[12]。慎海雄认为，“2000多年前荀子表达的‘民齐者强’的政治思想，点出了凝聚共识的重要性”^[13]。陶文昭教授的研究以中国近代为逻辑

起点并指出：“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无论是搞改良还是搞革命的，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在拯救民族危机、追求民族复兴。这需要不断凝聚民心、谋求共识，实现中国梦这一最大公约数。”^[14]

2.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指导

第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有学者认为，“解决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进一步谋求最大公约数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的历史是由人民自身所创造，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15]。第二，马克思主义民主观。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揭示了实现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是民主的本质体现，谋求最大公约数的最终归宿在于谋求全体民众的根本和长远利益^[16]。第三，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学者杨光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结成政治联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思想，深刻蕴含人民参与、团结合作、妥协共赢的理念和精神，对谋求广大民众意愿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根本指导作用”^[17]。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生成提供了直接指导

第一，毛泽东最大公约数思想。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最大公约数思想的重要特点在于革命实践中注重各位党员同志的积极协商、讨论，对于政策的决策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使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紧密联系在一起，谋求最大的共识^[18]。第二，邓小平最大公约数思想。在谋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强调协商存在于党的领导之间，而且存在于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以此共识才能更好达成^[19]。第三，江泽民最大公约数思想。有学者表示江泽民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特点在于实现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着重发挥人民政协在国家发展

和民族振兴事业中的作用、保持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20]。第四，胡锦涛最大公约数思想。学者刘秀玲指出，“胡锦涛最大公约数思想特点在于必须推进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发展，政协组织要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21]，为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现实逻辑

首先，最大公约数的现实生成来源于中国国情。中国在静态上大而杂，国土广、人口多、差别大；在动态上变而快，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交织叠加。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在现代化的转型之中，经济成分、生活方式、组织形式都日益多样化，基于复杂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各色思想意识，相互之间差别、矛盾乃至对立现象比较突出。在这样的国情中，凝聚社会共识变得极为紧要和迫切^[22]；其次，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特征看，寻求最大公约数是调整深层次利益关系的迫切需要。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人们活动的内在驱动力^[23]；最后，从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看，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寻求最大公约数。寻求最大公约数是不同利益群体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实现个人的幸福与尊严，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国梦^[24]。

四、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价值

（一）理论价值

第一，建立“共同体”意识。有学者表示，在谋求“最大公约数”的进程中，全球化时代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理念和价值必须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相契合。一个民族国家谋求的“最大公约数”要体现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才能助推世界文明的发展，为世界文明和“共同价值”增添新的元素。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会有最基本的共识^[25]。第二，包容“同”中之“异”。裴学进教授从核心价值观角度出发，认为最大公约数在于“异中求同”，在求“同”基础之上，认可以“非公约数”形式存在的其他价值观，并不断包容这些价值观^[26]。

（二）时代价值

第一，因应当代中国时代特点。过去 40 年，中国依靠改革开放不断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从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的亮点。然而我们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各种挑战，唯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公约数^[27]。第二，符合世界潮流与趋势。全球化时代，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日益密切。寻求民心与人文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可以促生新活力，深化文明交流与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8]。

（三）应用价值

第一，政治层面。有学者从统一战线角度阐述寻求最大公约数具有广泛应用价值。如在基层协商民主中，地方党委政府为协调利益常常把基层协商民主工作交由统战部牵头并取得重要成效，切实增强了利益相关方的各界群众的获得感^[29]。第二，党建层面。有学者指出：“能不能、会不会、善不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不仅是衡量领导干部政治定力、思辨能力和工作张力状况的重要标尺，也是衡量领导干部情商、群商、政商高低的重要标尺。寻求最大公约数对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亲和力、凝聚力、引领力具有重要价值。”^[30]第三，社会层面。吴忠民教授表示，“当今社会矛盾凸显的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各个群体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尚未真正形成，整个社会没有达成普遍接受的共识，社会内部出现一些离心因素。积极寻求全体人民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对于形成社会共识，凝聚全体人民，增强党的自我定力、社会感召力及社会动员力，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实施具有重要价值”^[31]。

五、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实现路径

许多学者认为实现最大公约数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如通过协商民主、政党之间的议事合作或者培育并弘扬核心价值观。这些方式构成实现最大公约数的基本路径。

（一）通过协商民主寻求最大公约数

第一，以协商实践寻求最大公约数。祝灵君等人认为，“商量是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关键，凝聚共

识需要商量。在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实践中,党员干部只有经常与人民群众商量,才能找到并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巩固领导核心的地位”^[32]。学者蔡洪理也认同商量是找到最大公约数的有效途径,“领导干部遇事能不能想到群众、能不能同群众平起平坐商量,是判断领导干部心中有没有群众、群众分量有多重的试金石。所以出台政策、制定规划、决定事项时,领导干部要同利益攸关的群众及时商量、充分商量、广泛商量”^[33]。第二,用协商制度找到最大公约数。刘伟教授表示,“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关键在于相应的制度保证和程序规范。他进一步表明要确定协商主体之事的范围和类型,协商议题、事项和平台,还需建立并遵守议事规则”^[34]。

(二)通过政党之间合作寻求最大公约数

第一,完善政党协商。马一德教授认为,“最大公约数落地生根必须建设高素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牢记和传承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不断加强对广大成员尤其是骨干成员的监督和管理。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切实增强履行职能的能力和水平”^[35]。第二,用好政协平台。如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已成为新形势下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阵地和品牌。其议题一般年初确定,列入全国政协年度协商计划。与会人员为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相关部委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围坐而谈。协商气氛热烈有序,与会者畅所欲言。双周协商座谈会真正体现了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精神^[36]。第三,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学者李克表示,“统一战线是寻求最大公约数最长的包容半径,只要我们的统一战线守住政治底线,坚持求同存异,尊重和包容差异,就可以找到最大公约数,结成最大政治联盟”^[37]。

(三)通过培育并弘扬核心价值观寻求最大公约数

第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郭建宁教授认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历史进入新时代,社会思潮、价

值判断、利益诉求不断多样化,寻求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最大公约数,需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8]。第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避免利益调整可能带来的思想对立和混乱,形成最广泛的价值共识,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39]。

六、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研究的评析与展望

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关于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主要见诸于报刊、期刊论文,未有相关学术专著,缺乏深刻性与系统性,对有些问题仍处于探讨或争鸣之中。

概括归纳起来,当前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第一,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内涵。多数学者认同“共识论”,“共识论”成为最大公约数思想内涵的主流声音,引起众多学者共鸣。有一些学者认为最大公约数思想是一种“平衡论”抑或是一种“统一说”。不过这些学者对于“平衡论”和“统一说”没有具体展开,尤其是对于“统一说”笼统且抽象,对民众意愿和民众利益辩证统一的论述较少。第二,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生成逻辑。最大公约数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这已成为学界基本共识,但具体阐释时缺乏论证性。如历史层面没有展开,文化渊源论述缺乏厚重性;理论层面的论述逻辑性较强,但仍需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断深化。第三,最大公约数思想的价值。对此,学界认为主要有三大价值:理论价值、时代价值以及应用价值。绝大多数学者对应用价值作了深入探讨和阐述,因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需求,但在理论价值与时代价值层面挖掘略显单薄,与实际联系密切性不够,传播力有限。第四,最大公约数的实现路径。多数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是实现最大公约数的有效途径,但有些学者认为实现最大公约数还有其他途径,比如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学者对于最大公约数的实现作了深刻的逻辑

论证，但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关于最大公约数落实细节、落实后的评价机制与体系缺乏规范性，对于如何改善和优化落实最大公约数的布局则欠缺整体性设计。

基于当前学界研究现状，本文认为，今后学界围绕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第一，进一步厘清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科学内涵。最大公约数最初是个常见的数学名词，它是指两个或多个整数共有约数中最大的一个。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最大公约数”是一种引申意义，因此，对于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研究，首先应探讨如何对这一概念进行规范性的界定，并进一步研究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超越性、规范性的价值从何处得以体现，探索如何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加以融合。此外，对于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内涵中的“统一说”要深入探讨，对意愿和利益关系作出阐释，深入理解意愿和利益之间的辩证统一。

第二，深入挖掘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资源。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同存异”、“兼容并包”文化的研究，厚植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形成的文化之基；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最大公约数论述的理论资源，强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研究，丰富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历史和理论资源；积极研究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成果，筑牢实践之基。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不断探索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深入发展。

第三，加强对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功能和价值研究。一是要进一步挖掘习近平最大公约数的理论价值。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理论价值既是寻求命运共同体，更是凝聚广泛的社会共

识，画出更大同心圆。如何使同心圆的半径更长、交集更大应当成为学界未来努力探索的方向。二是要加强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时代价值研究。当下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面临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努力探索和研究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时代价值变得尤为重要。三是要积极拓展应用价值研究。学界不仅需要加强对政治、外交、党建层面的研究，还需要开拓经济民生方面的研究。民生是国家发展之根本，只有谋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发展思想才会变得有价值。

第四，进一步推进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创新。首先，强化比较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于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赋予了民主新内涵。深化对民主本质问题的认识既要与西方进行横向比较，探索西方国家对民主本质的认识与我国的区别，也要与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认识史进行纵向比较，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真谛的论述是如何与过去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其次，推进价值批判与规范建构相结合。对于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研究既有经验层面的也有价值层面的，未来研究要从强化访谈、调研、案例实证分析等方面入手，对寻求最大公约数进程中的评价指标作出具体规范及可操作的评价体系。积极总结过去推进最大公约数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从学理上赋予最大公约数更多战略意蕴。最后，推进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涉及领域广泛，目前学界的研究绝大多数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研究，是系统研究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必然要求。如借助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为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研究带来新气象、新面貌。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1.

- [2]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5-05(02).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2.
- [4] 杨卫敏.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学习习近平关于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重要论述[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05):3-10.
- [5][10] 杨建义.着眼“价值最大公约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思想教育研究,2016(02):27-31.
- [6] 汪涛,赵彦云.改革要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经济学诠释[J].现代经济探讨,2015(09):16-19.
- [7] 刘倩.找准生态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N].中国自然资源报,2019-09-24(03).
- [8] 杨颖.论在全社会意愿最大公约数前提下“抓落实”[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4(04):8-10.
- [9] 王树臣.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探究[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05):11-15.
- [11][37] 李克.最大公约数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统一战线关系探析 [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7(03):81-86.
- [12] 丁蓓.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寻找民意最大公约数[N].北京日报,2014-09-24(03).
- [13] 滕海雄.寻求推进改革开放的最大公约数[N].新华每日电讯,2013-01-11(01).
- [14][22] 陶文昭.中国梦:寻求共识最大公约数[N].光明日报,2014-05-19(011).
- [15][23] 肖潇,肖新发.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的三维探析[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401-405.
- [16] 言浩杰,李婧.习近平新时代民主思想探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8(05):16-19.
- [17] 段治文,杨光.论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四种形态[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7(06):5-16.
- [18][19] 肖光荣.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和现实价值[J].湖湘论坛,2017(06):5-12.
- [20][21] 刘秀玲.中国协商民主的历史进程[J].天津市社会学报,2014(01):26-31.
- [24] 谢迪斌.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根本价值追求[N].南方日报,2013-12-23(F02).
- [25] 叶险明.“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J].哲学研究,2017(06):3-12.
- [26] 裴学进.习近平“确立价值观最大公约数”论断的深刻蕴涵与重要创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01):43-50.
- [27] 周国辉.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大公约数[N].科技日报,2019-03-07(04).
- [28] 郑筱筠.夯实人文基础“最大公约数”深化亚洲文明交流互鉴[N].中国民族报,2019-06-28(05).
- [29] 杨卫敏.论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战略思维[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01):4-18.
- [30] 杨卫敏.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大统战”理念的集中体现和灵活运用[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03):3-7.
- [31] 吴忠民.社会公正是全体人民意愿最大公约数[N].光明日报,2015-06-03(013).
- [32] 祝灵君.党群关系是同心圆[N].学习时报,2020-01-13(002).
- [33] 蔡洪理.有事好商量[N].联合日报,2014-11-11(001).
- [34] 华智超.用人民民主的真谛寻找最大公约数[N].长江日报,2018-03-26(06).
- [35] 马一德.促进“人民民主的真谛”落地生根[J].北京观察,2018(08):56.
- [36] 吴晶晶.寻求最大公约数汇聚发展正能量[N].人民日报,2016-02-04(04).
- [38] 郭建宁.核心价值观:社会共识“最大公约数”[J].人民论坛,2014(24):24-26.
- [39]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凝心聚力的“最大公约数”[N].人民日报,2014-08-21(020).

责任编辑:宋好

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的话语演进及其时代意义

——基于建国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的文本考察

黎锐楷

摘要:自建国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话语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在这一历程中蕴含着三大话语建构逻辑的基点,分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践”、“基于‘新时代’话语特色及话语内涵”。同时,“新时代”这一话语表达拥有着“锻造自信”、“拥抱时代”、“引领世界”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话语演进;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24-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这一重大的战略性判断,对于我们科学全面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时代性变化和实践性要求,科学正确地制定各领域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的演进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择从建国以来的历次党代会的文本作为考察的依据,在宽广的历史视域下看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表达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把握其逻辑基点,掌握其时代意义。

一、三大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话语演进历程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高呼:“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2]新中国走过了70年的峥嵘岁月,期间,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了十九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一份党代会的报告都或多或少对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进行阐述。梳理清楚其中的内容,明白它“说了什么”和“为什么说”,这将有助于全面宏观地掌握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的话语演进历程,深刻地透视出“新时代”话语的深刻内涵。

通过整理,在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涉及历史

收稿日期:2020-04-28

作者简介:黎锐楷,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方位或发展阶段的话语表达有“新形势”、“新时期”、“新阶段”、“新时代”、“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时期”、“XX时期”、“XX阶段”等表达，其中“新形势”、“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时期”、“XX时期”、“XX阶段”是通用性的表达，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视内容的需要而灵活使用，而“新时期”“新阶段”“新时代”则带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迹，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整体上勾划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话语演进历程。

（一）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的任务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因此，党的八大报告关于当时的发展方位作出如下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3]“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一判断，一方面指明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则有着浓厚的“革命”的实践界定和话语色彩。

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革命”一词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二十几年的话语体系的核心词，对于它的不同理解直接引发着社会实践的巨大调整，加之当时党内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完善，第九、第十次代表大会一直到了1969年、1973年才召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方位的话语表达更是深受当时严重的左倾错误影响，报告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后经历史检验是错误的话语表达。但是，即使是在这一艰难时期，我们亦不能忽略一些具有历史经验的有益探索，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呈现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话语表达，这表现出我党对社会主义的笃定和坚持。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4]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史方位的一次全面性的话语表达。“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表述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的建构与努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认识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前提下，更多地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定位的话语表达上，是在坚持基本方向基础上追求有特色的表达，追求符合改革开放实践变化的新表达。这表现在党代会报告上则是“新时期”、“新阶段”的出现与阐释，并且它们经历了三个小的演进历程。

第一个历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这一时期，“新时期”和“新阶段”相继提出并交叉互用，辅之以“新的历史时期”，没有做太大的区别。如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在提出奋斗总任务时所设定的发展方位是“新的历史时期”^[5]，且在后续行文中多次使用，而在阐述党的工作时则是用了“新时期”^[6]一词。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在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怎样的历史方位这一问题上都做概述，但两者的表达是不一样的。党的十三大认为：“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7]它使用了“新阶段”一词。而党的十四大则是这样论述的：“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8]“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9]它用的是“新时期”一词。但无论是“新时期”，还是“新阶段”，其前面的定语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的。”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方位的话语表达，更大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位的崭新表达，更大的贡献在于肯定“改革开放”的主题，

更大的作用在于为后来者在此命题上的阐释规范了主旨和形式。

第二个历程，自“南方谈话”至中国“入世”。这一时期，“新阶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主流表达话语，同时更加注重其话语主旨的升华。“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0]党的十五大则是更加鲜明地指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1]党的十六大对过去建设成就进行回顾时，亦做出了相似的表达，“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12]总的来看，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对于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话语表达进行了升华，增加了“现代化”的表述。

第三个历程，自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之前。这一阶段，“新阶段”一词继续使用，同时关注新世纪所带来的世情国情民情的新特征，突出这一时间节点的表达。党的十六大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3]要“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这个奋斗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14]“只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5]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是指出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16]，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17]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新世纪以来的建设成就进行回顾时，亦是用了“新世纪新阶段”来进行界定这一时期的历史方位。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新变革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8]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剧烈变化的世情国情民情，审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经济全球史的定位和变化，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19]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0]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是“进入了”，是一个完成时的表达，这预示着我们为进入“新时代”是有一个探索和沉淀的过程。当我们回溯党的十八报告时，不难发现，党的十八报告正是为“新时代”这一崭新的历史方位做了话语表达上的准备和积累，报告舍弃以往惯用的“新时期”“新阶段”的话语表达，使用的是“新的发展阶段”“新形势”“新的历史条件”等普适性名词；更为重要的是，报告在论述生态建设时，提出“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1]“新时代”一词已经提出，虽然只是作为生态领域发展方位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为十九大重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更是对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话语表达上的继承发展与崭新探索。

所以，总的来说，“新时代”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导向。它是中共共产党立足于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日新

月异的国内发展现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所做出的崭新话语表达。

二、三个基点：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话语建构逻辑

“新时代”，这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的崭新话语表达，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演进历程，还有着严密的话语建构逻辑，体现为三大话语基点。

（一）理论基点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形态受制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其必然会分化为多个发展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又即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预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期……政治上的过渡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22]它可以整体性概括成为“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三个阶段。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并不仅仅在于记住了有多少阶段，更重要的是在于把握住理论背后对于社会演进客观规律的尊重，对社会形态发展必然性的揭示，对唯物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充分运用。恩格斯曾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3]“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24]放眼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如何定位和正确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所处的发展历史方位，将事关能否正确看待成绩，能否正确看待自己，能否正确放眼未来的一个关键性理论问题。

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新时代”依然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并没有超越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国情。它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5]的重要表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阶段划分的实质要求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时代性相结合的，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定位的认识逻辑一脉相承的。

（二）实践基点

理论来源于实践，“新时代”的新表达，正是基于党的十八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新成绩，所经历的新变革，所面临的新矛盾，所形成的新思想，以及各方面实践的变化。从发展成绩来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不断提升，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如此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发展变革来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正在前所未有地大刀阔斧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力图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从社会矛盾来看，“落后的生产力”的提出已经不太符合我国的发展实际，“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6]是现阶段我们必须下大力气予以解决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指导思想来看，党的十八以来各方面的迅速发展使得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7]，从而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基于这些区别于以往，具有明显时代意义的发展实践新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话语表达需要贴合实际，与时俱进，“新时代”便应运而生。

（三）语言基点

话语表达，在一定程度是要看话语本身所蕴

含的意义是否能够满足现实的发展需要，其话语特色和内涵更会随着实践需要变化而变化。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再到“新时代”；从“新时期/新时代”到“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新阶段”，再到“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需要看到它们自身所带有的语言特色和语言内涵的差异性，从而更好把握住“新时代”这一话语表达的鲜明意蕴。

阶段，是指事物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节点在时空上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可分性和矛盾性，因为“事物根本矛盾在长期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28]而在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结束，现实政策的变化带来了社会实践的显著差异性，历史呈现出了阶段分明的特征。因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比较好的地诠释了这一时段的历史方位。同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计划经济体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入世”后，我国经济要融入全球经济的浪潮中，昔日局限于国内市场的生产销售模式要迅速改变，这“一增一减”实践变化都与“阶段”内涵相符合。而“时期”一词，往往是指代具有某种特征的一段时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以前，“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时代特征，使用“改革开放新时期”一词来定位当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恰如其份地凸显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指向性。最后，时代一般是指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阶段，它一般囊括的时间长度比“时期”要长，它带有的时间色彩比“时期”要更明亮和出色，它蕴含的时间特征是要比“时期”更丰富。因此，用“新时代”更能表现十八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发生的变革，更能诠释出昂扬向上，努力奋斗的时代精神，更能昭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三、三重意义：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话语时代意义

（一）锻造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正在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它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9]

他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0]我们应当做到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用中国概念诠释中国经验，将自身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和自信优势，又能以各国民众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方式来进行表达，使得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展现出应有的影响力。

“新时代”，就是一次成功的话语实践。它以鲜明亮丽欢快的话语形式表达了对新时代政党自信、国家自信、人民自信的深情呼唤，又避免与世界各国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产生话语摩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自信的理由根据，塑造了全党全国全军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支撑、内生动力和战略定力。

（二）拥抱时代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31]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国各族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32]，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前所未有的反腐强度、前所未有的斗争深度，开创了政治清

明严肃、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欣欣向荣、社会和谐有序、生态持续向好、军队能打胜仗，外交积极有为的大好局面，迎来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其次，这一时代，又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接棒期。从党的十九大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奋斗十五年，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到2050年，我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再次，这一时代新课题的提出，新矛盾的凸显，新形势的叠加等无不时刻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智慧。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住这多重时代特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将成为重中之重的实践性问题。“新时代”的崭新表达，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进入新时代，既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发生的变革，也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前景。”^[33]它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内涵，阐释了中国特色、中国优势、中国命运，准确和恰当地回应着新时代的现实诉求和未来走向，体现了鲜明的中国话语风格、中国话语特色和中国话语气派。

(三)引领世界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34]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率先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了领先地位，建立起了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西方中心论”占据主流。进入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最终的结果是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迷。“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然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革命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强势崛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势力衰减，现代国际秩序演变迎来百年不遇的历史转折点。”^[35]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

展时期。新中国70年的艰苦奋斗，聚改革开放40多年的辉煌成就，汇党的十八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步前进都前所未有地受到全世界目光的聚焦，“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模式”备受各国人民的关注与探究。在世界舞台上，“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参与国际上的各种事务，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36]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央正日益发挥着引领新一场国际秩序变革和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如何把握和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释放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友好善意，说明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下需要向世界各国人民作出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表达，既肯定了自身，又充满了友好，更带来了信心。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7]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的话语表达所带给各国人民最大的信息，彰显了社会主义具有光明的前景，也必将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引领和推动世界历史实践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19][20][26][27][31][32][3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17-10-28.
-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9-10-02.
- [3] 中央档案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57.
- [4][16][1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胡锦涛文选(第2卷)

-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17,622,623.
- [5][6]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64.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2.
- [8][9][10][19]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 (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13;214;217.
- [1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 (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
- [12][13][14][15]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2;528;544;552.
- [18] 王伟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
- [2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7.
- [23][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23.
- [25]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28]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9.
- [2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6-07-02.
- [3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 [33]陈金龙.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机遇[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6).
- [34]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6-24.
- [35]孙明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J].红旗文稿,2018(6).
- [36]王毅部长在外交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EB/OL].(2020-04-09)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jyh_673099/t1187515.shtml.

责任编辑:龚万达

加强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建设初探

马中红 刘泽宇 胡思洁

摘要: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应体现出参政微信的定位和特色,以区别于政务微信。为此,本文选取民主党派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共57个微信公众号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清博指数和自行编码的微信公众号运营评价指标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上榜的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整体表现尚可,但存在刻意模仿政务微信运营模式、定位不够清晰、缺乏独特的微信风格、微信内容公文化、忽视微信后期维护、忽略新技术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平台基础架构,培养掌握新媒体传播技能的编辑队伍,调动全员参与优质内容创作,依托新技术构建民主党派传播矩阵,建设复合型参政新媒体平台等建议。

关键词: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参政微信;传播矩阵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31-07

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民主党派要适应信息化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和探索开展网络统战工作,既要善于做好“面对面”的工作,也要善于做好“键对键”的工作,通过线下线上的良性互动凝聚人心。移动互联网是一项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统一思想的重大工程,对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服务社会等各项工作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如何利用微信公众号做好民主党派宣传工作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少量文献局限于将统战部门开设的微信号与民主党派开设的微信号置于同等条件下进行比较(九三学社北京市委课题组^[1],2017),有些研究结论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撑(张华

新^[2],2017),有些研究则过分依赖第三方新媒体舆情监测平台提供的数据(张天舒,2018^[3]、2019^[4])。同时,上述研究基本是从管理者视角出发,强调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做好“统战工作”的属性,而缺少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加强自身建设视角所进行的研究,更缺少对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分析。本文着重通过对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进行内容分析,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对策。

一、有别于政务微信公众号的参政微信公众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5],政务新媒体指各级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内设机构

收稿日期:2020-05-11

作者简介:马中红,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研究、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刘泽宇,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品牌传播研究;胡思洁,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

在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上开设的政务账号或应用,以及自行开发建设的移动客户端等。政务微信号是政务新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功能包括:推进政务公开,强化解读回应;加强政民互动,创新社会治理;突出民生事项,优化掌上服务。政务微信号的核心是“政”与“民”的互动,目的是要建设利企便民、亮点纷呈、人民满意的“指尖上的网上政府”,这与本文所要探讨的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有很大区别。

根据各民主党派章程,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参政党的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基于此,本文认为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是指,各级民主党派在微信平台上开设的公众账号,主要功能在于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以及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与宣传。与政务微信“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政”、“民”关系不同,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更注重民主党派成员之间良好关系的建设,更强调对民主党派履职、提案、与会、调研、历史、成就、成员等相关情况进行宣传,一方面提高成员对所属党派的认可度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提升民主党派的公共形象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只有积极建设与政务微信有所区别的、具有民主党派特色的参政微信公众号(以下简称参政微信),方能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

二、民主党派参政微信现阶段建设基本情况

本研究首先通过网络搜索得到8个民主党派中央级微信公众号;其次选择清博指数2019年1—7月民主党派上榜微信公众号前10%作为分析样本,由此获得17个民主党派省级微信公众号(累计上榜次数有并列)、32个民主党派地市级微信公众号。课题组对上述57个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情况进行评估,设定了包括基本设置、内容、形式、传播效果、后期维护、技术支持六大一级评价指标和相对应的几十个二级评价指标(表1),以综合研判各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质量。

表1 民主党派参政微信运营评价指标

基本设置	微信ID设计、微信认证、微信介绍、个性化自动回复、具有辨识度的微信头像、联系方式
内容	标题栏目化、封面图与文章关联度、推送内容(特别是底层菜单)关注的内容。细化类目为:党派介绍、往期回顾、微信矩阵、党内活动、党员风采、招牌栏目、第三方链接
形式	编辑一致性、第三方平台支持、图片使用情况、音视频使用情况、编辑手段、微信二维码设计
传播效果	阅读量、在看数、开通留言区、留言区互动情况、关联微信矩阵、设置原创
后期维护	更新频次。按照推送信息频次高低可分为毫无规律、多日一次、一日一次、一日多次

统计以人工手动为主,选项得分从1起始,正向分布;得分越高,显示该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在此部分的表现越佳,其中,两选一类问题中,“没有”得1分,“有”得2分;频次类问题中,“从不”得1分,“偶尔”得2分,“经常”得3分;多选题类问题中,每一选项得1分,可累加。

(一)中央级参政微信基本情况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行各业爱国进步人士参政议政已成为重要国策。目前八个民主党派均开通了中央级参政微信号。根据2019年7月清博指数(简称WCI)统计数据显示,8个公众号的WCI指数分别为:中国民主建国会(535.68)、中国民主同盟(511.54)、中国农工民主党(496.58)、民进网(484.4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460.78)、九三学社之声(422.69)、中国致公(417.24)、台盟(237.91)。通常,WCI指数越高,表明公众号在“整体传播力”、“篇均传播力”、“头条传播力”、“峰值传播力”四个维度上的表现更为优异。当然,WCI指数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受党派规模、人数影响,但基本上能反映出参政微信的活跃度和质量。

(二)省级参政微信基本情况

清博指数显示,2019年1—7月上榜的民主党派省级参政微信为150—170个左右,表明并非所

有民主党派省级组织都已正式开通参政微信。根据综合发布频次、文章数、阅读数、在看数、活跃度、传播度、认可度、稳定性等指数进行排名,本文选取上榜公众号前10%的17个省级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作为样本,并依据表1的微信公众号运营评价指标,对其进行测评,结果见表2:

表2 省级参政微信六大评价指标得分情况

序号	微信号名称	基本设置	内容	形式	传播效果	后期维护	技术支持	总计
1	上海民革	10	7	36	14	1	5	73
2	浙江民进	11	6	36	12	2	5	72
3	上海民建	10	7	32	13	3	6	71
4	农工福建省委	12	9	33	10	2	5	71
5	上海农工党	9	7	33	13	3	5	70
6	上海民盟	12	5	35	9	2	7	70
7	九三浙江省委员会	11	6	32	15	1	5	70
8	民盟河北省委	10	8	35	10	1	5	69
9	浙江民革	11	9	30	10	2	6	68
10	辽宁民革	11	5	33	11	3	5	68
11	吉林民盟	10	8	32	12	1	5	68
12	九三上海市委	9	6	31	14	2	5	67
13	江苏民盟	11	5	32	13	1	5	67
14	河北民建	9	5	32	15	1	5	67
15	四川民盟	10	9	32	9	1	5	66
16	黑龙江民盟	10	6	32	11	1	6	66
17	福建民建	11	7	30	12	1	5	66

数据显示,在基本设置和技术支持上,省级参政微信得分较为均衡,表明各参政微信在“基本设置”方面比较完善,但在“技术支持”方面的运用普遍比较弱。在内容与形式上,17家省级参政微信之间分差达六分之多,表明某些省份参政微信在内容上得分较高,内容较为丰富,且包含更多栏目设置;某些省份参政微信在形式上得分较高,说明其排版设计较为规范、精美,反之亦然。

(三)地市级参政微信基本情况

同样根据清博指数,我们发现2019年7月较活跃的民主党派地市级微信公众号共有270个。采用与抽取省级参政微信样本同样的方式,我们对地市级参政微信上榜频次进行统计,得到32个上榜次数达到三次及三次以上的微信公众号。其中,杭州九三、杭州民革、九三秦皇岛市委、潍坊民革、宁波民革、农工党巴中市委六个微信号2019年1—7月每月均上榜,表现优异、稳定。

与此同时,我们也对32个上榜的地市级参政微信号进行评估,以反映出这些帐号在基础设置、

内容、形式、传播效果、后期维护、技术支持六个方面的具体情况。结果显示,32个地市级参政微信可以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总分在70分以上,第二梯队总分在69—60分,第三梯队总分在59分以下。三个梯队的参政微信号在基础设置、微信内容、后期维护、技术支持四个方面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基础设置的最大差距为12—9分,仅三分之差;微信内容为10—6分的四分之差,表明32个参政微信在基础设置和内容两方面虽有差异,但并不悬殊。后期维护和技术支持的得分率都比较低,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不太如人意;微信形式中最高分为38分,最低分为25分,两者相差13分之多;传播效果中,最高得分为15分,最低为7分,两者相差8分之多。三个梯队的参政微信号在形式和传播效果两个方面拉大了距离,排名在第一梯队的,在各方面基本上都表现出良好的态势,相反,第三梯队的两个微信号各方面表现则略逊一筹。

参照六大评价指标对参政微信进行测评后发现,省级参政微信得分较为均衡,而地市级参政微信则呈现明显的两级分化,尤其是在传播形式和传播效果上表现较为明显;在后期维护与技术支持上,省级参政微信与地市级参政微信得分均较低,可见民主党派省级与地市级参政微信对这两部分均重视不足。

三、参政微信的问题与不足

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类新媒体平台发布的海量信息都在争夺读者注意力,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表现手段越来越多样化。信息过剩的情况下,对参政微信的内容质量和表达形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次研究发现,参政微信在运营传播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内容政务化、公文化、程式化,编辑水平参差不齐,不重视后期维护和忽视使用新兴技术等方面。

(一)参政微信内容政务化、公文化、程式化

本研究对57个参政微信的底层菜单进行了内容分析,建立起以下类目并加以统计:党派介绍、往期回顾、微信矩阵、党内活动、党员风采、招牌栏目、联系方式、第三方链接。统计数据显示,在

57 个参政微信中，具有“党派介绍”内容的占比 63.16%，有“党内活动”的占比 63.16%，有“往期回顾”的占比 35.09%，有“党员风采”的占比 35.09%，有“第三方链接”的占比 28.07%，有“招牌栏目”的占比 24.56%，另外，提供联系方式的占比 22.81%，拥有微信矩阵的占比仅 14.04%。

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主要围绕本党派内活动展开，普遍模仿政务微信的做法，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政务化、公文化和程序化，上情下达的通知式行文是其最大的特点，内容主要围绕领导人来组织和展开，鲜见其他参与者。具体表现为：有领导出席的活动或会议优先作为头条推送；开展的活动高度抽象化，参与的人员也高度抽象化，缺乏具体、个性、鲜活的内容；党派会务，尤其是围绕党派负责人的告知性内容偏多，可读性比较差。

（二）编辑水平参差不齐，风格呈现较为杂乱

本研究对 57 个参政微信的版面“编排一致性”进行了统计分析。“编辑一致性”是指具有明显的排版规则，包括字号、行间距、段前段后设置、图文搭配方式、首行缩进、字体颜色、对齐方式等。根据统计数据发现，57 个参政微信的平均得分为 2.42 分，介于“相对一致”与“非常一致”之间，表明大部分参政微信有统一设计文章版面的意识，初步形成了统一风格。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参政微信号编辑水平起伏较大，在同一公众号内，有的文章排版精美，有的文章却非常粗糙，甚至出现同一篇文章内字号、行间距不统一的情况。在阅读微信文章和观察微信号时我们发现，有些公众号由多人共同负责编辑，但由于缺少固定标准和统一风格，文章编辑情况差异明显。例如在“安顺民建”参政微信七月份的推文中，同一公众号相差 4 日分别推送的文章，在排版、字号、图片大小等编辑风格方面差异较大。

借助第三方平台“秀米”、“135 编辑器”等进行编辑是微信公众号最常见的方式。统计显示，57 个参政微信中，82.36% 的账号经常使用第三方编辑器。第三方编辑器提供大量版式素材，同时也带来

版式、字体颜色花哨等问题，与参政微信较正式的内容风格并不一致，需要编辑加以特殊处理，因此形成统一的编辑标准和风格十分重要。

（三）忽视后期维护，影响传播效果

总体看来，当前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在对公众号的传播与维护上表现不如人意。首先，发文频次和时间均无规律。由于参政微信大多数以发布党派活动为主，基本形成有活动则发、没有则不发的情况。统计发现，有 30 个参政微信号无发文规律，占比达到 52.63%；仅有 11 个参政微信显示出“一日一更”的发文规律，占比 19.30%；另有多日一更和一日多更，分别占比 24.56% 和 3.51%。在微信推文时间上，各帐号均显示出较大的随意性，缺乏规律。发文频次、推文时间不固定，难以培养读者的阅读习惯，对阅读量的影响较大。其次，留言区缺少互动。数据显示，57 个参政微信中有 44 个开通了留言功能，占比 77.19%，但仍有 13 个尚未开通，占比 22.81%。微信留言是阅读者表达想法和建议的重要渠道，留言区的互动既能反映微信公众号的活跃度和“经营”状况，也能体现参政微信的“参与性”。然而，在 57 个参政微信中，仅有 2 个参政微信会经常性地与读者互动，7 个参政微信偶尔与读者互动，而从不与读者互动的参政微信高达 48 个，占样本总量的 84.21%。再次，单打独斗，缺少互联共享。2014 年 7 月“微信通”平台推出一项新的应用模块——微信矩阵。微信矩阵主要指多个主题相关的微信号，通过纵向垂直管理、横向整体统筹的方式形成经济体，互为展示和彼此链接。在本次抽样的 57 个参政微信中，仅 14.04% 的参政微信设置有微信矩阵，而其余 85.96% 的参政微信目前依然停留在“单打独斗”状态，并未有意识地与同党派的上下组织、平行组织之间形成互联、互动、互享、互推模式。

（四）囿于图文混编，疏于使用新技术

图文结合是微信公众号文章最常见的呈现方式，在 57 个参政微信中，98.25% 的公众号经常在文章中插入图片，与文字相呼应。除图文之外，目前最新版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可以插入音视频等

多媒体表现手段，而在本次调研的参政微信中，有意识使用新技术手段的并不多，31.58%的公众号偶尔会插入音视频，其余64.91%尚未尝试过。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更新，微信平台不断开发出如H5、小程序等传播形式，而这些具有相对较强技术要求的形式，在本次调研抽取的参政微信中几乎没有使用到。

四、参政微信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民主党派参政微信是我国统一战线宣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行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职能，完善各民主党派的自身形象，增加凝聚力，扩大社会影响，需要不断优化参政微信的建设。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平台基础架构；培养适应新时代新媒体语境的编辑队伍；发掘党派优势，调动全员参与创作优质内容；构建传播矩阵，建设复合型参政新媒体平台等。

（一）明确参政微信定位，重视新媒体平台建设

各民主党派应该根据自身职能和特色做好基层社情民意的发现和传达，建立完善的新媒体社情民意系统，将为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提供快捷便利的渠道。因此，民主党派参政微信应完善对微信公众号基本内容的设计，加强内容信息板块建设，在参政微信底层菜单设立专门栏目/窗口，方便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

同时，各级民主党派领导层应提高对参政微信等新媒体的认知，重视新媒体技术对参政议政的重要价值，加大对新媒体平台的关注和投入。建议各民主党派设专人负责参政微信的运营，采取自上而下的责任机制，真正做到上层重视、中层落实、基层服务的民主党派参政微信新模式。要总结现阶段民主党派优秀新媒体平台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信息快速流动的传播特点，为应对5G时代的到来树立“移动优先”的原则，加紧对相关新媒体的建设。

民主党派参政微信要改变过去有新闻则推送，没有新闻则停更的做法，主动收集党派成员先进事迹、典型故事等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内容，建

立专门的素材内容储备库，采取以标签化、栏目化为区分的专栏特色内容，定时、定点推送相关民主党派内容，使读者养成良好的关注和阅读习惯。

（二）加强编辑人才培训，释放党派成员写稿热情

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微信为主的新媒体发展变化尤其迅捷，微信公众号的版本迭代频繁，无论是编辑手段、效果维护还是技术支持方面，几乎每过几个月就会有变化。微信公众号平台自上线以来，已经发布了七个版本，仅2019年就进行过几次大的改动。目前各民主党派参政微信编辑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对于平台属性的认知度和技术变化的适应性也不一致。各民主党派参政微信号应加强编辑运营团队的专业化建设，根据新媒体从业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等相关标准在民主党派内部进行遴选，或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并对编辑团队进行定期的业务培训，强化编辑技能，储备编辑人才。

在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的编辑团队后，各参政微信号应对文字、字号、行间距、风格等基本设置进行统一规范，保持编辑风格的相对统一，再借助第三方编辑辅助器美化版面。编辑过程中，要时刻树立读者意识，增强读者阅读体验，尽可能多地使用导语、小标题，方便读者快速浏览文章信息，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在党派内部建立绩效激励机制。一方面，鼓励民主党派成员提供素材，参与稿件的策划或撰写；另一方面，明确考核运营指标，激励编辑队伍深入基层寻找新鲜素材，提高稿件质量，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主党派新媒体从业人员创作的积极性。

（三）完善平台基础设置，形成特色整体风格

民主党派参政微信要统筹组织、统一完善现有平台基础设置，包含但不限于上文提到的六大指标体系，争取形成独特风格，提升公众号的完整度和辨识度。

民主党派参政微信虽与政务微信、商业微信不同，但是可以借鉴运营良好的政务号、商业号的成功经验。首先，根据自身性质和优势打造具有特

色的整体风格。比如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传媒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该党派参政微信设计风格和内容应当彰显相应的特色。其次，参政微信要及时回应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号召，关注一定时期内参政议政的核心议题，如扶贫、教育、医疗、特色小镇等，组织党派成员深入基层，履行民主党派的权力和义务，并将鲜活的内容及时在参政微信上予以发布，引发党派内外的共同关注。第三，提升民主党派参政微信内容的多样性、趣味性，定期策划“爆款”文章，以媒体关注度带动党派认知度。

在整体编辑过程中，加入当下受众喜闻乐见的音视频等元素，丰富民主党派参政微信的表现形式。另外，优化栏目的整体包装，改变过去人们对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排版丑、内容陈旧”的刻板印象，重新树立民主党派参政微信新形象。

(四) 突破扁平化传播格局，打造多层次多主体的互动体系

首先，重视对党派成员参与活动的报道。民主党派人士多以各行各业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精英人士为主，他们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个体，有着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人生故事，民主党派参政微信应充分调用这些素材，以更具象、更有感染力的方式报道他们的事迹，避免抽象的、模糊的群像描摹。其次，适度取消原创声明方便共享和推文。民主党派参政微信应适度取消原创声明，方便各级民主党派参政微信互相转发学习或再编辑使用。既能够形成中央层面自上而下的推广，也可以形成地方基层自下而上的层层影响，从而建立起各级民主党派参政微信信息互通共享的机制，从而加强本党派内部纵向的联系以及不同党派间横向的交流。再次，激活参政微信与读者间的互动。微信作为当今流行的社交媒体之一，其互动性显得尤为重要。民主党派参政微信与读者的互动多基于其内容下设的留言功能，在方便人们互动讨论的同时，参政微信运营者们应及时回复留言信息，加强留言区的互动，从而增加民主党派参政微信的粘连性与亲和力，切实提高互动传播效果。

(五) 建设民主党派三级传播矩阵体系与复合型参政新媒体平台

随着自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的兴起，人们的阅读习惯与关注焦点发生了巨大变化，短视频已成为当下颇具传播力的信息载体。2019年8月26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宣布正式入驻今日头条——“民进网”头条号正式上线，同时“民进网”企鹅号也即将开通，这些都标志着民主党派在新媒体平台宣传路径将更加多元化。建立民主党派联动宣传三级传播矩阵(如图1)，构建复合型参政新媒体平台，探索民主党派新媒体宣传新窗口刻不容缓。



图1 民主党派三级传播矩阵体系

一级传播层为跨平台间的传播。以参政微信平台为基础，探索跨平台(微博、抖音、头条号、百家号、企鹅号等)的信息联动机制，构建新时代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新媒体综合体系。二级传播层为各级民主党派委员会下设的参政微信，建设参政微信矩阵传播。另外，许多民主党派会员拥有个人公众号或微博账号，有的甚至是该行业内的知名“大V”，是信息传播中的“意见领袖”。民主党派复合型参政新媒体平台应向下覆盖这些民主党派“大V”的个人号，努力建立完备的民主党派内部上下各级之间互联、互通的微信矩阵和第三方链接，加强各级民主党派参政微信之间的联系。

(六) 鼓励使用新技术，提倡依据数据分析组织内容

一些勇于创新的参政微信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微信投票、小程序等微信功能,如为配合中共中央组织开展的“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2019年7月24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发布专文详细介绍入选者——民革党员、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同志的事迹,并组织开展为“最美奋斗者”候选人投票活动,引起民革组织内极大的反响。另外,“中国致公”精准扶贫的“酉好货”平台,“中国农工民主党”友情链接中的“奇麟果商城”、“乌蒙农商城”等均是民主党派参政微信对微信小程序的大胆尝试。这些微信小程序借助第三方技术支持,开发专属于民主党派扶贫工程的线上直销平台,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

民主党派参政微信应更加积极地尝试新媒体技术,在VR、H5、小程序、全息影像展示等方面做出新突破,将AI人工智能与5G通信模式所带来的新体验、新表达纳入参政微信优化计划中,借助

大数据、云分析更准确地调整微信内容信息,加强视觉表现,增强用户体验,吸引用户主动转发、订阅,以扩大民主党派参政微信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课题组.统一战线理论研究(2017)[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298-309.
- [2] 张华新.新媒体背景下的高校统一战线微信公众号运营对策研究[J].大众文艺,2018(7).
- [3] 吴凡,张天舒.网络统战视野下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影响力研究——基于优质推文的内容 [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6).
- [4] 张天舒,张栩栩,蒋锐.参政党网络影响力研究——基于796家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1).
- [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EB/OL].(2018-12-27).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12/27/content_5352666.htm.

责任编辑:宋好

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三点”论

——基于调研基础上的亮点、难点以及着力点分析

姚跃传

摘要: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领域的高校,其统战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如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推进高校统战工作新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文章作者通过对全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等 30 所高校统战部长个别访谈和工作实践,阐述了高校统战工作的亮点,分析了高校统战工作的难点,进而提出了推进高校统战工作持续发展的着力点。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三点”论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38-05

高校民主党派成员众多,还有侨联、知联会、留联会等统战团体,是高校建设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进一步加强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使高校统战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对于凝心聚力、团结奋斗、促进高校“双一流”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的亮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1]。党的十八大尤其是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以来,

高校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战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上级统战工作文件精神,使高校统战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改进,整体来看,在当前的高校统战工作中,表现出“六大亮点”:

亮点一:打造格局,健全机制,高校统战工作得到党委的高度重视。高校党委高度重视统战工作,采取有力举措加强统战工作:一是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高校党委领导、行政支持、统战部协调抓总、各部门密切配合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二是大部分高校都先后制定了《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中期规划》等文件,突出统战工作的重要

收稿日期:2020-3-26

作者简介:姚跃传,合肥工业大学党委统战部长,副教授,双学士,安徽省政协委员,安徽省高校统战工作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统战工作研究分会长务理事、监事。

地位,营造统战工作的良好氛围,切实履行各级党组织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将统战工作纳入校院(系)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与宣传工作计划中,并作为党校重要教学内容和校院(系)两级领导班子年度工作考核内容之一。秉持统战工作是全党工作理念,坚持重心下移的原则,在各院(系)设立统战委员,明确统战委员工作职责,发挥统战委员积极作用,党委定期召开统战工作会议,研究部署统战工作,鼓励支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大力开展表彰活动,高校党委还十分重视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对他们取得的突出成果给予奖励。

亮点二:维护核心,服务中心,不断加强对党外人士思想政治引领。高校党委始终坚持政治上进行引导、思想上给予关心、生活上予以关照、业务上提供支持,建立思想调研、情况通报、大事协商、慰问走访、联谊交友等制度,结合中央重大决策和相关会议的重要精神,在开办的政治理论学习班和研讨班中进行学习研讨,教育引导党外人士自觉加强自身思想建设,不断提升党外人士思想政治水平。建立统一战线工作微信公众号,用好党外人士微信群、QQ群等新媒体,加强思想引领,做到线上互动,线下交流。以“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跟党迈进新时代,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通过“暑期三下乡”活动、高端论坛等多种形式,引领党外人士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亮点三:积极谋划,稳步推进,大力推进高素质党外人士队伍建设。高校党委高度重视党外人士队伍建设,把高校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和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换届作为高校党委的主体责任和重要工作内容,坚持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可的标准,严格按照程序规定,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为了使高层次党外人士队伍和相应的储备人选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各高校党委高度重视选拔、培养、推荐工作,在定期举办党外人士和中青年党外人士骨干培训班时,各高校都努力做好分层分类培训工作,并且在培养选拔领军人物方面,不少高校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实施了“三个

10%计划”,即:党外干部占高校处级干部比例不低于10%;处级后备干部中党外干部比例不低于10%;每年安排的党外干部挂职锻炼人数不低于挂职干部总数10%。

亮点四:搭建平台,热情服务,进一步推动党外人士积极发挥作用。许多高校都制定了《党外人士参与学校重要问题协商》《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等制度。重要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定期召开学校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意见会、情况通报会听取党外人士对学校改革建设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有的高校每年就重点难点问题,通过设立相关课题的方式,委托民主党派组织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议政、加强自身建设等问题,定期举办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研讨班开展学习研讨交流;注重加强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引领,协助各民主党派统筹做好新成员发展工作。鼓励民主党派就经济社会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参政议政、建言献策^[2],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人才智力优势和组织优势。

亮点五:扩大交流,注重调研,不断提升统战理论与实践创新水平。高校党委站在高校“双一流”建设和高校统一战线发展的战略高度,对统战工作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不少高校都成立了统战理论相关研究机构,与高校统战工作的实际相结合,积极开展高校统战工作和理论的研究。不仅如此,高校还积极申报中央、省统战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并获得表彰。对于日常统战工作中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高校及时将其转化为对加强和改进高校统战工作举措或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继承传统,厚植优势,深入推进高校统战工作的创新发展。

亮点六:提升素质,改进作风,进一步加强统战干部队伍自身建设。高校党委注重加强符合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发展要求的统战干部队伍建设,将统战干部队伍建设纳入高校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工作总体规划,拓宽视野,关口前移,注重

物色,大胆使用年轻的统战部长,使高校统战部长年龄结构得到明显优化,使统战部长队伍更显生机活力。大部分高校已做到统战部长由党委常委担任或兼任,使统战工作话语权进一步加大、统战工作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统战工作成效进一步增强、统战工作氛围进一步浓厚。高校党委加强统战干部培养培训,帮助他们提高能力素质。积极选派统战干部参加校内校外各级各类教育培训,选派统战干部到校外挂职锻炼,使他们在实践中真正增长才干。

二、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的难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统战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这是主流应充分肯定。但一些高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出“五个难点”。

难点一:对统一战线工作认识缺乏共识性。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统战部门设置缺乏共识性。高校统战部门有独统设置(独立设置统战部)、组统设置(组织部、统战部合而为一)、人统设置(人事处、统战部合而为一)、宣统设置(宣传部、统战部合而为一)、办统设置(党委办公室、统战部合而为一)、机统设置(机关党委、统战部合而为一)、团统设置(校团委、统战部合而为一)、无统设置(无统战部,统战工作由有关部门负责)等等。二是一些高校领导对统战工作的认识缺乏共识性。虽然高校都自称“高度重视统战工作”,但也有一些高校并非如此:有的高校领导认为统战工作对学校发展贡献不大,认为党外人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在大会小会不提甚至很少提到统战工作;有的高校工作计划中没有统战工作,即使有也就简单的可有可无的一句话;有的高校一年从不专门开会研究统战工作、从不专题集中学习统战理论政策;有的高校领导认为做统战工作出不了大成绩,不做统战工作出不了大问题,不学习、不懂得统战政策和方法。

难点二:对党外人士教育培训缺乏针对性。一是高校对党外人士教育培训计划缺乏针对性。一些高校尚未建立完备的党外人士教育培训体系,

只有年度的教育培训和简单的教育培训管理制度,缺乏对教育培训的思想需求分析,只是根据高校年度工作计划,安排教育培训内容,且没有与教育培训成效评估相结合,好像只为培训而培训,受训党外人士随意性较大,有时出勤率难以保障。培训形式和方式较单一,如:单向的报告、讲座等,缺乏对党外人士思想状况的深入了解,造成有时教育培训投入较大但效果不够明显。二是高校党外人士教育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如一名身兼多职的党外人士一年要参加多次培训,有本校统战部组织的培训、有本校组织部组织的培训、本校所在部门组织的培训、上级民主党派组织的培训、人大政协组织的培训、上级统战部各部门组织的培训等等,培训内容有许多是重复的。

难点三:对党外人士队伍建设缺乏长远性。一是部分高校对党外人士队伍建设规划缺乏长远性。高校一般都制定了干部队伍建设五年规划,党外干部虽然包含其中,但哪些部门该安排党外干部以及如何配置党外干部缺乏统筹规划和明确要求,制定包含党外干部在内的党外人士队伍建设的规划就更少。二是一些高校对党外人士队伍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缺乏长远性。一些领导还没有完全从新时代统战事业的高度充分认识党外人士队伍建设工作的重要性,有的领导认为“党内优秀人才多,用不着到党外找”;有的领导认为党外人士安排仅是政治需要,对学校建设发展推动影响不大,从而对党外人士队伍建设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有的领导注重把优秀人才吸收到党内,而不注重留一些优秀人才在党外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外人士队伍等。同时也有一些党外人士也认为只有加入中共才有机会向更高层次发展,形成党外人士的流失。

难点四:对统战工作机制创新缺乏主动性。一是对建立健全统战工作机制缺乏主动性。一些高校对根据校情和需要建立健全统战工作机制缺乏主动性,上级统战工作文件一般具有指导性、原则性强的特点,高校应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制定出操作性强的具体实施方案。有的高校基本照抄照搬

上级文件；有的高校对上级文件精神落实不及时、甚至不落实；有的高校从不会主动出台一些统战工作文件和制度，致使统战工作面临问题多、抓手少、平台窄、难推进。二是对现有统战工作机制实施效果的研究缺乏主动性。高校对已有的机制、制度实施效果评估不够，导致实施效果并不明显：如将统战工作纳入领导班子考核范围，对统战工作的权重比究竟应该有多大，高校认知度差异较大，缺乏有效的指导和研究，基本上由各高校说了算。

难点五：对统战干部队伍建设缺乏全面性。高校统战部门人员配置缺乏全面性。新形势下高校统战工作任务明显增多、工作强度明显加大、工作要求明显提高、新的统战团体成立和运行、民族宗教工作明确由统战部牵头等，使高校统战部门压力倍增，上级统战部内部各部门的工作都需要高校统战部落实，而高校统战部人员编制机构基本没有变化，不少高校独立设置统战部的配置人员基本上3人左右，非独立设置统战部门的统战部长精力根本忙不过来，如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兼统战部长的，因工作太忙花在统战工作方面的时间和精力明显不够。

三、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的着力点

高校统战工作确实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展中的问题，是不断改进的问题。因此，推进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必须把握“五个着力点”：

着力点一：提高政治站位，落实主体责任，着力在深化思想认识上下功夫

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高校党组织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的基本要求，充分认识高校统战工作对推进党的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高校应担当的重要使命。进一步认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要着力构建好高校党委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大统战格局，不断注入统一

战线推动“双一流”建设的合力；要真正发挥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功能，完善统战部协调抓总、各部门相互配合的统战工作新格局；在切实落实好高校校院(系)两级党组织在履行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把统战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应取得的更大成效上下功夫；建议上级统战部门要开展调查研究，研判高校统战部门设置多元化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对各类设置分析利弊，从更有利于推动统战工作的角度出发，出台《加强改进高校统战部门设置的指导意见》。

着力点二：坚持政治引领，优化各类培训，着力在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功夫

高校统战工作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引领贯穿于学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教育培训的全过程，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党外人士政治坚定的根本要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育培训的重点，以“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教育培训的主题，坚持教育培训内容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有效性^[3]。做到坚持政治上引领、思想上关心、生活上关照。要坚持定期开展党外人士思想状况调研，分析调研数据，撰写调研成果。要教育引导党外人士自觉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帮助鼓励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加强思想建设，加强对“统一战线微信群”等网络媒体的管理和引导，做到政治教育线上引导互动、线下交心交流。建议高校上级统战部门、高校民主党派上级组织与高校统战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建立党外人士教育培训综合协调结构，对党外人士教育培训统筹考虑，科学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和培训学时，避免过多的重复培训与多头培训，避免影响高校教师中的党外人士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建议民主党派省(市)委与高校统战部门加强联系沟通，建立高校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人的教育培训、评奖评优等事先通报机制，进一步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

着力点三：立足高校实际，着眼长远规划，着力在培养考核使用上下功夫

高校统战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建立一支高素

质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在制定学校干部队伍建设的中长期规划时，也应制定相应的党外人士队伍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做到早规划、早物色、早培养、早选拔。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对高校党外干部的配备要有原则性指导意见并加强督促检查落实。上级统战部门对高校党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安排要有更科学合适的比例。高校党组织要把政治引领融入到党外人士队伍建设各环节并加大对党外人士培养使用的力度，做到在物色培训中团结人，在实践锻炼中激励人，在安排使用中感召人。以学校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和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设作为加强党外人士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和重要工作内容。要进一步坚持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可的标准，严格按照程序规定，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要认真落实党外人士定期协商、传达重要文件、重要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等制度，充分发挥党外人士对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4]。

着力点四：扩大平台建设，推进制度创新，着力在统战工作实效上下功夫

高校扩大统战工作平台建设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扩大高校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平台，建立高校统战部与民主党派省（市）委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的定期协商机制，使高校统战部协助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更具有效性，也使民主党派省（市）委对加强基层建设增强积极性，双向发力，共同推进；二是扩大高校统战部对党外干部选拔、考核发表意见平台。高校党组织应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规定的“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协作配合机制。在动议和讨论决定党外干部的任免、调动、交流前，应当征求统战部门的意见”等相关内容，年度对党外干部考核有关党组织也应认真听取统战部门意见。三是要扩大党外代表人士发挥作用的激励平台。党外代表人士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取得突出成效的，高校应给予适当激励并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时充分考虑，折合分数纳

入其中，党外代表人士中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人应适当减免教学工作量和给予津补贴。高校党组织应坚持统战工作制度创新，建立适合校情又能较好地推进统战工作的一系列制度。

着力点五：提高思想认识，选配统战干部，着力在加强队伍建设上下功夫

做好高校统战工作，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统战干部队伍是关键。选拔统战干部要符合“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要求，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统战工作需要。一是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范围更广泛。包括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以及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等，二是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要求更高。如何发挥好新时代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如何加强对高校党外人士政治引领，如何推进党外人士“双岗”建功，助推经济社会和学校“双一流”建设等，都对做好新时代高校党外人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改变有的高校对统战部长任命更换过频的状况，对统战部门干部配备要适应新时代统战工作需要，在新形势下高校统战工作任务明显增多、工作强度明显加大、工作要求明显提高的情况下，从统战干部数量和质量上加以保障，全面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

参考文献：

- [1]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15-05-21).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5-05/21/content_35621788.htm.
- [2] 丘德珍,周晓玲.新时代发挥高校党外人士在人民政协中作用探析[J].政协天地,2019(08):36-37.
- [3]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在“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民革优良传统首场巡回讲座的动员讲话.2017-04-21.
- [4] 罗天云.增强新形势下高校统战工作活力问题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9(34):73-74.

责任编辑：鲍跃华

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的产权法治保障

马弋涵 秦国伟

摘要:产权制度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以坚持依法、平等、全面等原则为核心,保护各类市场交易主体合法权益的产权法治,是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重要要求和保障。构建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需要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产权法治建设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基础上,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产权法治建设,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司法保护体制,全面履行法治政府职能,以更有力的法治举措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关键词:营商环境;民营企业;产权法治;平等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43-07

一、引言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生产力。2019年2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突出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明确要求尊重市场规律,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把平等保护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1]

中国的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在地位和待遇方面是有差别的,民营企业与公有制企业、外资企业因所有制或投资主体的不同,享受的待遇也不尽相同。现实中,民营企业相较公有制企业,市场地位明显弱化,经济力量也较为薄弱。正因如此,我

国《宪法》自1988年到2004年间,先后三次对私营经济的相关规定进行补充和调整,现行《宪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行鼓励、支持、引导,同时依法对其实行监督和管理。随着《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物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完善,我国逐步形成了对私营经济进行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民营企业在法律框架下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由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加之世界经济受贸易保护主义及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

收稿日期:2020-01-12

作者简介:马弋涵,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教授,机关纪委副书记,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经济法。秦国伟,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一级主任科员,研究方向为管理学。

给我国经济和市场预期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民营企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尤其是一些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不够到位，涉及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产权侵害案件时有发生，社会反映强烈，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对市场的经济预期和投资意愿，直接导致国民经济中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制造业占比下降，成为国内动能衰减、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的重要原因。在此形势下，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短期内不仅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给民营企业家迅速打上“强心针”、吃下“定心丸”，中长期看，更要积极发挥产权法治的根本保障作用，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营造各经济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二、产权法治保护对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产权保护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通过产权保护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同样成为社会共识。

(一) 产权法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

对于经济发展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指出，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法治的规则，法治通过约束政府和约束经济人行为这两个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2]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能够合理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制定完善市场经济统一的制度化规则，创造科学高效的商主体制度，更重要是能够确认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尤其是保障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人身权、财产权不受侵犯。如何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有学者认为从法治化的角度观测，营商环境表现为产权保护、涉企收费、行政法治、公正司法、信用法治等不同的面相，其中将产权保护列在首位。^[3]还有学者认为，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的关键因素是产权保护制度的法治化、宏观经济政策的法治化和产业政策管理的法治化；^[4]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最根本措施，是增强竞争的平

等性，强化竞争中的基础性制度条件，尤其是要完善对各类企业的产权保护制度。^[5]针对刑法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保护上存在的区别对待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当着力构筑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体系，通过立法赋予民营企业更多的市场权利，将宪法的精神更好地贯彻到各个部门法中，清理有违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条款，强化民营企业的刑事司法保障，及时出台指导性文件，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6]

(二) 依法平等保护是产权法治的重要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继续深化改革、加强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都先后出台了多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利好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权益。^[7]这些重要论述都着重强调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特别是把“平等保护”作为重要原则提了出来。在 201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确立了“产权平等保护”原则，提出“将平等保护作为规范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8]为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产权提供了政策依据。2017 年 10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正式颁布实施，明确“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要求“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这就为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产权提供了法律依据。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三个依法保护”，即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9]为提升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环境；2018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要求“坚决破

除各种不合理门槛和限制，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出台，释放出国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营企业发展动力的态度和决心。到2019年，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力度更大、精准度更高，各地区各部门纷纷将2019年确定为营商环境提升年，并出台多项法治措施，提高顶层政策的落地效应。

（三）通过产权法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符合国际先进经验

通过完善法律制度，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并迅速提升全球排名的做法，符合世行的价值观与方法论。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简称DB2019），我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已经跃居第46名，^[10]较DB2018第78位一举提升32位次，改善幅度居全球第三，东亚太平洋地区之首，成为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我国DB2019排名的提升，是在国家没有修改任何一部法律的情况下实现的，主要依靠政府行政职能的革新，通过不断实现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的标准化、便利化和透明化，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提升了营商环境排名。然而，法律要素在世行评估指标中比重高达62%，如果之前提升排名靠的是政府“放管服”改革的行政要素，那么目前看来提升空间几乎用尽，如果不重视法律要素，我国在世行DB2020的排名势难提高。根据国际先进经验，全球很多排名领先的经济体，诸如新加坡、新西兰、丹麦、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多是通过完善本国法律制度来进一步提升世行排名。这表明，营商环境的优化需要规范的制度建设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来实现保障和提升。因此，研究我国如何在现有的市场基础和政策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民营企业平等保护和公平竞争的产权法治建设，对于再次提升世行排名，增强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产权法治的司法实践：一个被甄别纠正的产权案例剖析

2018年，原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文中改判无罪案，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宣判的第一个重大涉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冤错案件，成为我国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标杆性”案件。

（一）再审改判无罪

2009年3月30日，张文中因涉嫌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宣判，判决上述三项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2013年2月，张文中经两次减刑获释后，开始走上漫长而曲折的申诉维权之路。2017年12月27日，最高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审被告人张文中提出的申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新审判条件，遂决定直接提审本案。

2018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张文中案。经最高法审理认为，原判认定张文中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均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随后，最高法在5月31日公开开庭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中无罪。并依法启动了该案后续的国家赔偿、已执行罚金及追缴财产的返还等工作。

（二）典型案例蕴含的产权法治建设启示

司法案例是司法智慧的结晶，最高法依法改判张文中无罪案，不仅为全国法院审理企业家涉产权案件提供了样本和范例，也对完善民营企业产权司法保护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和启示：第一，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第二，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涉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案件，将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不规范行为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考量，准确理解国家政策精神，把握政策的发展变化，严守民事纠纷与犯罪的界限，可以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第三，优化营商环境，要注重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司法保护。司法系统在对待公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上要一视同仁，统一涉产权案件裁判尺度和标准，在平等保护的基础上，在司法裁量权的范围内，给予民营企业家优惠保护，

真正把司法在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中的保障作用发挥到位。

四、加快产权法治建设，为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产权保护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国产权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距离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满足广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热切期待和需求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目前，针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以各种名义侵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的行为时有发生；司法实践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产权保护不够重视、不够公平、不够全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顶层设计，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加大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的产权保护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一）落实全面依法平等保护原则

当前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遇到的困难，其核心不在市场本身，而在于竞争环境和准入条件的不平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所谓平等保护，就是对这一要求的深化落实，不戴“有色眼镜”看待不同所有制企业，不论是民营还是国有，不论是参股还是控股，不论是外资还是内资，法律均应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和保护。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全面依法平等的原则落实落细。一要建立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要在平等保护的基础上，坚持做到全面保护，不仅要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物权、债权、股权等有形财产权利，也要平等保护相关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11]三要坚持做到依

法保护，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法律制度和相关规定，妥善处理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涉嫌违法问题，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强化法律实施，确保将平等保护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让法律成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护身符，让法院成为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坚强阵地，让公权力成为捍卫民营企业家和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坚固盾牌。

（二）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民法典编纂工作，完善物权、合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制度，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将平等保护作为规范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12]

民法典作为社会的基本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平等和自愿。这次编纂民法典，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统一民事法律规范、消除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遏制国家权力滥用、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激发社会活力，从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目前，在总则部分，已明确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那么在民法典各分编中，就应当通过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等具体编目的细化，进一步丰富民事权利的类型，加强对具体民事权利的平等保护。比如，物权编在《物权法》规定的各类民事主体物权受平等保护的基础上，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这意味着，各类民事主体的物权和其他财产权都受法律的同等保护；在侵权责任编，不仅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滥用权力，而且要求他们积极履行职责，否则也要承担责任，这就全面深化了对民事主体的保护。尤其重要的是，民法典将建构一个完善的民事权利体系：在人格权方面，增加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在内的一般人格权和生命权等具体人格权类型，提升了人格权的保护水准；在财产权方面，它规定了物权、知识产权、股权、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权，扩大了财产权的保护范畴。

在商事法领域,《反垄断法》也需回应时代要求进行修订,保护以财产地位平等为基础的市场自由竞争公平竞争。这方面主要有三点建议:首先,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删除《反垄断法》第一章第5条“允许经营者集中”的规定。取消允许集中的法律条款,不仅可避免与第四章第28条“集中的禁止”之间的立法冲突和实践困境,还将从根本上反对各种形式的垄断或者变相垄断,有助于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其次,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今后所有行政机关和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部门,在制定或起草的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法规,都应当通过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公平竞争审查;清理废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性文件,确实需要保留的各种补贴或优惠政策应当向社会公开。第三,坚决反对行政垄断。所谓行政垄断,是指政府机关和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行政垄断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一般可分为由行政机关直接实施的垄断行为和通过授权由特定企业实施的垄断行为两种。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同,我国要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不仅需要监管企业的经济垄断行为,更需要监管政府不同形式的行政垄断行为。但目前《反垄断法》中尚存有一些缺陷,比如第五章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认定,只列举了滥用行政权力强制垄断、限定商品、妨碍商品地区间流通、排斥或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经营、参与招投标活动等情形,却没有将行政机关通过授权国有企业专营、独占等方式实施行政垄断的行为纳入法律监管,造成这种处于“灰色地带”的变相行政垄断现象在市场中十分普遍。再如,《反垄断法》第六章对实施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仅规定为“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处理建议”,这不仅导致对行政垄断行为的监管失之于宽松软,还降低了反垄断执法部门的权威性。因此,需要根据国情完善相关条款,探索有效的法律责任追究办法和途径,从制度上避免行政垄断行为对

民营经济的影响。

当然,对产权立法保护还需要更多的法治和制度创新,应对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全面研究清理,对涉及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要一律废止。淡化乃至逐步取消以企业组织形式和出资人承担责任方式为划分标准的市场主体管理制度,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身份标识和行政级别,拆除一切针对民营企业的限制门槛,建立统一有序、开放协调的竞争性市场体制,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平等保护各类合法权益。

(三)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

要做好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从立案、管辖、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完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从源头上有效预防错案冤案的发生。对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要抓紧甄别,坚持有错必纠、有冤必反;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给当事人带来伤害和损失的,要依法予以国家赔偿。要充分吸取张文中再审改判无罪和其他侵害产权典型案例的经验教训,以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对于民营企业在创业和经营过程中,由于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完善,经济管理政策不够严谨科学等历史原因形成的产权案件,因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13]审判时还原经营行为发生的历史背景,结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地方政治、经济政策和客观的历史环境进行综合考量,依法妥善处理。

(四)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

司法机关要采取更加灵活细致的财产处置措施,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将财产处置对债务人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

涉企案件财产保全,要秉承审慎态度最大限度保障双方权益。实践中,如果申请人滥用财产保全权利,也容易对被保全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致使一些民营企业陷入生产经营困境。因此,要严格诉前保全审查,审慎采用对被保全人生产经营

会造成严重影响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确需采取强制措施的,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规范涉案财产置换程序,保护双方合法权益。诉讼中的财产处置措施难免会对涉案企业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这就需要配置完善的救济制度。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和处置涉案财物时,要建立健全财产分离机制,依法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不能将上述财产的执行进行混同,尤其不能在处置违法所得时牵连涉案企业和个人的合法财产。保全实施后,被保全人提出用等价值资产申请对被保全标的进行全部或者部分置换的,法院应当积极办理财产置换手续,被保全人提出执行异议的,要严格审查,依法办理。

(五)审慎把握关于民营企业的司法政策

根据国家相关统计,民营企业家面临的刑事风险概率和范围要明显大于国有企业家。前述分析的张文中再审改判无罪案,其最值得汲取的司法智慧就在于最高法严格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在法治框架内,从发展市场经济等角度对“罪与非罪”进行释法说理,对今后正确处理民营企业家相同类型的涉刑案件提供判例指导,规范法律适用尺度,为民营企业家营造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2018年底,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就明确提出:“对民营企业中一般违法行为以教育为主”。这说明,刑事司法介入经济活动应当牢固树立谦抑、文明等理念,谨守最后手段的原则。要认真落实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制度,充分考虑民营企业的经营特点,在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同时,有明显犯罪事实的,要坚决打击,但要准确把握入罪标准、量刑幅度和处罚尺度,尽量减少涉事主体的经济损失,维护其合法权益。

(六)实施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是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一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举措,增加知识产权侵权成本。目前,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专利法,而且新修改的专利法明确了要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商标法也将侵权的赔偿数额,由之前的“三倍以下”提高到“五倍以下”,这样的惩罚性赔偿额度在国际上都是比较高的。二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负面清单,将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情况纳入个人和企业信用记录,适时曝光信用记录,探索建立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联动机制。三要深化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国家机构改革要求,优化整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职责,统一对知识产权领域的监管和执法。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加快推广全国法院系统的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审判“三合一”改革,实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四要推动部门区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协作,发挥市场监督管理、知识产权、海关、司法等多部门多领域的联动执法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加大对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七)发挥政府在营造优良营商环境中的主导作用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既需要各市场主体主动作为,更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地方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既要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资源和市场活动的直接配置和干预,解决“越权、越位”的问题,又要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并着力为民营企业提供便捷高效、公平透明的公共服务,解决“缺位、不到位”的问题。要尽量保持涉企法规和政策的稳定性与延续性,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向企业做出的承诺义务,不能以“新官不理旧事”等理由违约毁约。要加强社会信用立法,将政府诚信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建立政

务失信问责机制，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失信联合惩戒制度。要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和权利救济制度。对民营企业土地、房屋等财产征收征用法律制度，要制定完善的实施细则，规范征用权限和程序，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同时，完善符合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实际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对涉及产权纠纷的小微企业维权援助机制；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和仲裁的积极作用，完善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参考文献：

- [1] 李小健.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J].中国人大，2019(5):29–30.
- [2] 高丽媛,张屹山.经济组织化对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深度融合的作用效应[J].社会科学研究,2019(2)86–93.
- [3] 谢红星. 营商法治环境评价的中国思路与体系——基于法治化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19(3):138–147.
- [4] 刘志彪.法治化环境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扫清潜规则[N].法制日报,2016–12–23(005).
- [5] 刘志彪.平等竞争：中国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优化之本[J].社会科学战线,2019(4):41–47.
- [6] 陈伟华.营商环境下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研究[J].北方论丛,2019(2):38–40.
- [7] 沈漠.产权保护顶层设计出台，民企迎来新机遇[N].财会信报,2016–12–05(A01).
- [8] 程德文.产权保护的法治化——“完善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智库研讨会综述[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4):185–196.
- [9] 全国工商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N].中华工商时报,2017–10–16(003).
- [10] 陈伟华.营商环境下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研究[J].北方论丛,2019(2):38–40.
- [11][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6(12):1–3.
- [1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6–11–28(001).

责任编辑：宋好

论新时代宗教工作创新推进的三个维度

李岁科

摘要:进入新时代,宗教工作作为党和国家全局中的特殊重要性工作,实现了创新推进。主要体现为认识层面提升到全局新高度,理论层面探索出理论新成果,实践层面开拓出实践新成效。新时代宗教工作在认识、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的创新推进,既是对当前宗教问题的重要阐释,也是当前宗教工作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新时代;宗教工作;宗教问题;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50-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既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清晰判断,也是对我国历史性变革的科学揭示。宗教工作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自然离不开对整个社会发展态势的科学把握,而新时代这一重要历史方位,也必将成为我国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引。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众多方面,同时,这些重大战略思想也贯穿到宗教工作领域,为我国宗教工作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九大报告指出“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那么,作为党和政府重要工作的宗教工作在新时代的创新推进是如何体现的?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召开了

一系列涉及宗教的全局性工作会议,提出了许多极具时代性的宗教工作理论,实施了众多极具针对性的重要举措,使宗教工作无论是在理论或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概括起来,新时代“宗教工作创新推进”主要体现于宗教工作的认识、理论、实践三个维度。

一、认识维度,将新时代宗教工作提升到全局新高度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认识和把握宗教工作,遵循宗教规律特点,结合我国国情与时代发展要求,深入研究各种涉宗教问题,切实提升对宗教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在思想认识层面,将新时代宗教工作提升到关系治国理政全局的新高度。

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社会总

收稿日期:2020-03-20

作者简介:李岁科,中共绍兴市委党校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2019年度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委托课题:新时代宗教工作的创新推进研究(课题编号:JD2019B002)阶段性成果。

问题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宗教问题,针对各种宗教的实际情况,提出一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方针和政策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打破封闭,处于与世界发展不可分割的社会转型的变动之中,宗教问题重要性得以不断凸显,党和政府把宗教问题与宗教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事务来推进。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指出:“做好宗教工作,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对国内外都有重要的意义。”^[1]1982年3月,中共中央指出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2000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作重要讲话,强调没有宗教问题的正确解决,就没有国家的团结、稳定、统一。2001年12月,江泽民在《论宗教问题》指出,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地位,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200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将宗教关系明确为是涉及国家全局的重大社会关系之一。可见,一直以来,针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我们党和政府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宗教领域依然面临着不少困难与挑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研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宗教工作形势,深刻理解宗教工作的重要性。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2]这充分说明了新时代党和政府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具体而言,新时代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不再局限于宗教本身,而拓展体现于五个重要方面。一是将宗教工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联系起来,宗教工作不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事务,而是与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能够影响到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二是将宗教工作与人民群众

的血肉深情联系起来,信教群众也是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开展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三是将宗教工作与社会和谐、民族团结联系起来,我国总体上信教群众的比例虽较低,但绝对数目很大,处理好宗教工作,将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而对于我国十个几乎全民信教的民族而言,将更有助于发挥民族团结作用。四是将宗教工作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处理好宗教工作有利于国家稳定,更能够有效抵御和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通过抓好宗教工作,进而有效避免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五是将宗教工作与祖国统一联系起来,宗教工作涉及面广,影响力大,通过宗教交流的纽带,能更好地促进海内外文化联系,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和统一作出贡献。面对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党和政府立足全局,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广泛凝聚力量,最大限度地将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从治国理政的新高度推进新时代宗教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二、理论维度,为新时代宗教工作探索出理论新成果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其既源自于实践,也指导着实践。通过实践的探索,必将有助于理论的提升。历史地看,推动宗教理论与所处社会相适应是对宗教工作开展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结合我国宗教问题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深刻阐述我国宗教工作的系列理论问题,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系列新成果。

(一)强调宗教工作关键在“导”

宗教工作与其他工作有所差异,存在其自身特殊性与规律性,通过强制或放任难以有效解决问题。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强调:“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2]做好宗教工作,关键在“导”,强调通过引导的方式抓好工作,

区别于一般意义的“收”与“放”。强调宗教工作关键在“导”，是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出发，结合我国宗教工作实际而提出的重要思想，宗教工作涉及意识形态，与人的信仰密切相关，难以通过强制方式去抑制，又不能完全对其置之不理，放任自由，只能通过讲政策讲政治的引导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宗教工作关键在“导”的提出，是对以往宗教工作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时代面对复杂宗教问题的新论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宗教工作领域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面对新时代的问题与挑战，要根据宗教工作关键在“导”的重要精神，切实推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努力使各宗教教规教义阐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为推进新时代发展广泛汇聚人心与力量。

（二）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宗教中国化问题，多次强调要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譬如，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两次重要工作会议分别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3]，“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2]。强调无论是中国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要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走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宗教在价值导向上应契合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导向上应接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浸润，在教规教义解读上应进行符合时代的阐释，同时还能够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极端宗教思想影响，切实发挥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正向作用。宗教中国化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重要思想，强调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要契合于所处国家与时代要求，决不能脱离国家与时代而空谈宗教，也不能按照国外宗教的标准去衡量评判中国宗教，更不能以改变国家和时代发展轨迹而去适应宗教要求。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指宗教在中国社会存续要适应于时代发展要求，服务于中国社会进步，用社会正能量引导广大

信教群众，深入挖掘宗教教规教义中有利于国家、社会、时代、人民的内容，使宗教能够符合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

（三）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把宗教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运用法律法规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事务，使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得以不断提高。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2]使法治在宗教工作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将宗教事务治理纳入法治体系，必将有助于宗教工作的规范运行。在我国虽然宗教信仰属于个人私事，但宗教界和信教群众首先属于国家公民，同时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事务等又涉及公共利益，遵守法律是国家公民的基本义务。可以说，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有其客观必然性。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首先要使各项宗教事务都能有序纳入法治轨道。其次是宗教事务管理者要有法治意识，按照法律规范去推进各项宗教事务，树立起管理者的法治理念。再者要依法保障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广大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心中筑牢法治理念，坚定认为法治是值得信赖和可以依靠的。同时，在宗教工作推进中，应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提高法治观念，涉及宗教因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性质就按什么性质依法处理。

（四）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

宗教关系是涉及国家全局性的重要社会关系，妥善处理好宗教关系问题，始终是宗教工作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要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并强调：“在我国，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2]可以说，这一论述极大丰富了宗教关系的内涵意蕴。宗教关系不

再局限于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宗教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宗教与政党、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宗教与外国宗教之间的关系等，使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阈去认知与把握宗教关系，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新时代宗教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重要性。要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必须立足于党的领导，筑牢党的执政基础，这是构建积极健康宗教关系的重要前提。同时，还应认识到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必须秉承政教分离原则。新时代宗教关系复杂多样，涉及面广，我们工作中应对构建积极健康宗教关系给予足够重视，以充分调动各方面有利因素，促进当前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五)指明宗教工作的特色优势

宗教工作是党和政府在我们治国理政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2]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充分说明，做好宗教工作，其实就是要从统战的方式着眼，我们要搞好与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团结工作。客观地说，目前我国信教群众数量较为庞大，如何将这些人更好地团结起来，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我们当前做好宗教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此，我们应学会跳出宗教来看宗教工作，做好宗教工作其实质是做好群众工作，通过统战的重要方式去汇聚人心、凝聚力量，将广大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敌对势力越是想借宗教问题做文章，我们就越是要把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以发挥统战的重要作用，更好服务于我们新时代的中心工作。如何真正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下与宗教界、信教群众结成广泛统一战线，这需要把握相应的原则方式。为更好地团结广大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应在政治上与其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与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广交朋友，多接触、多谈心，同时在生活上多关心照顾，在

工作上以理服人和以情化人，成为他们真正值得信赖的朋友，进而使广大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愿意跟党走，自觉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三、实践维度，为新时代宗教工作开拓出实践新成效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显示，目前我国宗教领域呈现较“多”现象，即信教群众多、宗教教职员多、宗教团体多、宗教活动场所多，对外交往多，与之相应的也会带来情况复杂和治理难度大等问题。进入新时代，宗教工作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和政府切实针对加强和改进宗教工作作出科学规划与部署，取得一系列实践新成果。

(一)进一步完善宗教工作机制

进入新时代，宗教工作涉及面广、任务繁重，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有效应对突出问题，以抓好重点推进全局工作，并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宗教工作领导机制。针对抓好宗教工作，充分发挥党委在引领、规划、指导、督查等方面的作用，统战部门起到牵头协调作用，宗教工作部门则负责依法管理，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则做好配合工作。同时，将宗教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以及将宗教工作相关理论方针政策及知识等纳入干部培训计划，有效加强党的宗教法律法规和宗教理论政策宣传等。二是建立党政领导与宗教界联谊交友机制。我们党与宗教界在“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基础上增进相互友谊，不断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党政干部与宗教界联谊交友机制，目前全国约有2万名宗教界人士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充分享有国家民主权利。三是建立宗教团体联席会议制度。为在宗教领域构建积极健康关系，促进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和管理水平提升，自2016年10月，建立起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制度，针对我国宗教领域的一些重要性事务展开研商，以增进交流与共识。同时，在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

制度的影响下，许多地方性宗教团体也逐步建立起联席会议制度，针对相应的宗教事务进行研商。四是发出国旗进宗教活动场所的制度性倡议。国旗是国家的标志性旗帜，是国家的象征，2018年7月，由各全国性宗教团体共同发出在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的重要制度性倡议，通过这一机制强化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深化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二）进一步加强基层宗教工作

基层是宗教问题的多发地，也是宗教工作的繁重地与薄弱地。为推进新时代宗教工作，基层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区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针对我国基层实际，在实践中切实加强基层宗教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宗教工作网络和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责任制”^[4]。特别是在宗教工作任务较为繁重的一些乡（镇、街道），有领导干部专门分管宗教工作，并明确专职人员负责，为基层宗教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保障力量与工作条件，形成基层宗教工作合力。二是明确基层宗教工作管理职责。根据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乡级人民政府应对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宗教事务。”^[5]基层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单位）进一步明确清晰了自身工作职责，为基层宗教工作开展提供制度化基础与依据。三是加强基层宗教工作干部培养。为加强基层宗教工作，锤炼出一支立场坚、责任强、业务精的宗教工作干部队伍，是开展好宗教工作的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专门将基层宗教工作干部的理论政策与业务学习纳入到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培训，以提升基层宗教工作干部培养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为新时代宗教工作锻造出合格的干部队伍。

（三）进一步维护宗教领域秩序

众所周知，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不仅涉及宗教自身的存续，也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定。

进入新时代，为有效维护我国宗教领域秩序，党和政府付出了极大努力。一是维护宗教领域安定有序。在集中整治宗教活动场所“被上市”、“被承包”基础上，于2017年国家各有关部门联合制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防止“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行为扰乱正常的宗教活动秩序，并严禁商业资本介入宗教。二是坚决抵制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面对猖狂的宗教极端主义，党和政府在实践中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自觉抵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针对一些宗教极端思潮与行为进行抵制。譬如，2013年1月，佛教界高僧大德与专家学者举行会议，向广大信教群众宣讲正确的生命观，反对违背戒律实施或煽动他人实施自焚的极端行为。2014年5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众多宗教界知名人士共同发出倡议，严厉谴责暴力恐怖活动。2016年7月，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举办大型研讨会，倡导中道，反对极端。2017年12月，我国各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合发出倡议，要防范与抵制邪教，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三是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随着社会发展，互联网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家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互联网宗教事务治理，有效整治网络及各种新兴媒介涉宗教的违法信息，对涉网络宗教事务的违法行为进行打击，以维护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四）进一步引导宗教界正信正行

我国宗教界有着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党和政府引导下，积极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为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引导宗教界对教规教义作出契合国情与时代的阐释。我国各宗教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与历史积淀，其中许多教理教义是与我国国情相契合的，在对宗教教规教义进行深入挖掘时，都是在努力保持基本教规、教义、礼仪基础上，作出契合国情与时代要求的阐释。譬如佛教、道教的讲经讲道，伊斯兰教的解经，天主教的民主办教，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

等,将优秀传统与现实需求结合起来。二是引导宗教界传承优秀历史文化。我国宗教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是密不可分的,许多宗教都蕴含了文化的基因。譬如佛教关注弘法利生与社会慈善,道教致力于尊道贵德、抱朴守真,伊斯兰教注重于团结、中道等,天主教积极推动教会本地化,基督教注意吸取中华优秀文化养分,促进社会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等。三是引导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在党和政府引导下,宗教界每年开展“宗教慈善周”活动,目前捐款数额已累积超过10亿元。我国宗教界还为一些重大灾难事故或重大历史纪念意义活动举行各种赈灾祈福等,同时还开展多种形式的敬老助学助残扶贫扶弱等活动,此外,还在社会中积极倡导绿色环保理念,建成一批生态寺观教堂。

(五)进一步增进宗教交流对话

宗教文化属于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各宗教在中国大都是相互借鉴、交融互生的,共同为传统文化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增进国内各宗教交流对话。进入新时代,我国不同宗教相互尊重、学习、交流、对话,并共同开创了“五教同光,共致和谐”的新局面,通过相互间交流、对话、协商的模式,促进了我国各宗教之间的理解与友谊。二是增进我国宗教的广泛国际交流。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宗教文化交流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通过正常的对外宗教文化交流,既可以体现我国宗教信仰自由,也可以增进对外友好关系。据统计,当前“中国宗教界已经与超过80个国家的宗教组

织建立了友好关系”^[6],其中包括许多不同文明与信仰的国际性宗教组织,譬如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伊斯兰世界联盟、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等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宗教组织。在对外宗教文化交往中,积极参与国际宗教组织的人权对话,发出中国宗教界的自信与文化之声。三是搭建中国宗教文化的世界平台。我国宗教界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为中国宗教文化的交流逐渐搭建起世界平台,彰显中国宗教文化自信。譬如,我国佛教界举办世界佛教论坛,我国道教界举办世界道教论坛,这两个论坛已成为重要的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平台。中国基督教与美国基督教联合在上海举办“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在美国举办“中国教会事工”交流会等,开展两国宗教文化的交流对话,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与友谊。

参考文献:

- [1] 龚学增.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研究[M].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248.
- [2] 习近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升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N].人民日报,2016-4-24(01).
- [3] 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人民日报,2015-5-21(01).
- [4]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N].人民日报,2015-9-23(05).
- [5] 宗教事务条例[N].人民日报,2017-9-8(17).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N].人民日报,2018-4-4(09).

责任编辑:鲍跃华

以瑶族文化重塑助推瑶族地区乡村振兴探析

——基于广西贺州的调查

龚 晨

摘要:瑶族文化的重塑或再建构,就是在充分尊重瑶族文化自身选择的发展规律基础上,实现瑶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发展。瑶族文化的重塑与瑶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存在着互动耦合关系,瑶族文化重塑对瑶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具有促进作用,瑶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有利于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探讨瑶族文化再建构问题,既需要清醒地认知瑶族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时代机遇和重大挑战,又需要清晰地把握瑶族文化再建构的重点内容、基本理念和遵循原则,更需要科学地构建瑶族文化创新发展的运行机制、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制度设计。应在两者协同发展的路径优化、保障支撑、机制创新等方面着力,强化两者互动,提高耦合度,形成最大化耦合效应。要摸清家底,夯实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基石;解放思想,增强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意识;把握规律,提升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效能;创新机制,强化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保障。

关键词:瑶族文化;重塑;乡村振兴;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56-06

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如何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保护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既要充分挖掘具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对民族村寨的保护力度,又要深入挖掘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其在新时代展现独特魅力和风采。这些重要论述,既为包含瑶族文化在内的少数

民族文化在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条件下再建构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民族文化灵魂,搭建有效平台指明了重要路径,提供了方法要求。据有关新闻报道显示,“目前,贺州瑶族人口约有 26 万人,占广西瑶族总人口的 1/6,占全国瑶族总人口 1/10”^[1]。贺州瑶族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如何利用好重大机遇,焕发出新活力,如何以瑶族文化的重塑,充分挖掘好瑶族文化的价值功能,助推贺州瑶族聚居区乡村

收稿日期:2020-01-22

作者简介:龚晨,湖南祁阳人,中共贺州市委党校副研究员,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党建、公共管理研究。

全面振兴,是时代赋予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

一、瑶族文化重塑与瑶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耦合互动关系

文化与治理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互促互进。面对农耕文明中深厚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情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2],对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要不断总结推广。基于此,可认为瑶族文化的重塑与瑶族聚居区乡村全面振兴存在着互动耦合关系,且有必要从两者耦合互动,协同发展的角度加以深入探究。

(一)瑶族文化重塑对瑶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具有促进作用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珍宝,瑶族文化反映了瑶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展现了瑶族经济、社会、政治等基本特征,内蕴着丰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以瑶族文化的再建构为抓手,助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乡村全面振兴,对于瑶族聚居区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是彰显地域文化特色。通过挖掘瑶族传统建筑中叉叉房、干栏式房屋、平地式建筑等民居文化特色,既展示了瑶族的生产方式、民族历史、风俗习惯,塑造出了因地制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村屯特色,又彰显出了乡村的历史、文脉、个性和特色,留住了乡村的风情和魅力,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文化底蕴更厚重,可为乡村赢得未来集聚发展潜能。二是有利于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瑶族世居山林,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其山地生态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对于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很有现实意义。通过挖掘瑶族文化中的生态观念、生态意识、生态行为、生态保护措施等现代价值,将传统村落保护与人居环境整治有机结合,高质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打造出乡土文化浓郁、宜居宜业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是大有裨益的。据调查,近年来贺州瑶族民族特色村寨保护驶入快车道,以平桂区槽碓村、昭平仙回茅坪村、瑶山村等为代表的民族特色村寨,通过加强对瑶族文化的保护与

开发,在促进人居环境改善与提升的同时,打造出了既生态宜居又有文化氛围,有助于瑶族文化传承发展的美好家园。三是有利于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打造特色瑶族民宿,举办瑶族民俗文化活动,培育瑶族文化产业,能有效推动瑶族历史遗迹、风情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发展,助推脱贫致富,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平桂区金竹村创办瑶绣扶贫车间,以“公司+绣娘+贫困户”发展模式,注重把瑶绣文化元素转化为经济元素,有力助推了平桂土瑶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其绣娘中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人,年收入可达2万元。四是有利于丰富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乡村文化自信。通过乡村文化振兴,加大保护瑶族文化资源力度,促进瑶族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有机融合,有力彰显出乡村“竹篱茅舍风光好”的原汁原味文化魅力、生态宜居优势,可提升瑶族文化整合价值、认同价值,唤起民众对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在文化浸润中增强文化自信。

(二)瑶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有利于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乡村文化转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涵。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的好坏,关乎民族聚居区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文化振兴与进步,更关系到民族聚居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乡村振兴战略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设了全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据调查,近年来,富川瑶族自治县以民族特色产业来培植壮大瑶族蝴蝶歌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使之参加香港地区、捷克等国家民俗民间艺术文化节活动,促进了其与国内外各地优秀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二是为瑶族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资源支持,让其传承和发展获得强有力保障。乡村振兴,是乡村的现代化建设,是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现代科技与乡村发展的完美结合。充分释放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后发优势和政策优势,让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发展获得更多发展条件,

这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身优势全面挖掘，必将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快速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财力保障。

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瑶族文化再建构的多维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探讨瑶族文化再建构问题，就是要将关注点聚焦在瑶族传统文化如何在乡村全面振兴语境中继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不仅要回答如何保持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瑶族文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如何使瑶族文化远古神奇魅力与时代发展要求相匹配的问题，更要回答新时代下瑶族文化与时代文化、外来文化怎样更好地交融、接轨的问题，进而形成瑶族文化传承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耦合叠加效应。

(一)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贺州瑶族文化再建构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贺州市的瑶族文化传承发展受到了高度重视，且取得了不少成就。一是瑶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发展态势良好。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等化，瑶族地区的基层公共文化基础不断夯实。到目前，建立起了富川民族中学、八步黄洞民族中学、钟山两安、花山民族中学和平桂区太平民族中学等瑶族特色学校，建立起了富川瑶族博物馆代表的瑶族文化博物馆，在昭平仙回、八步步头黄石等建立起设有地方民俗文化展示馆。瑶族文化教育基础设施、传承发展平台的完善，为瑶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也不断扩大了瑶族文化的传播影响力。二是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序推进，推广活动丰富多彩，开展效果良好。瑶族盘王节、瑶族服饰、瑶族长鼓舞等项目列为国家级非遗目录，贺州瑶族盘王大歌、瑶族溜喉歌、瑶族凿花、瑶族羊角长鼓舞、仙回瑶族调马等10余项项目列为自治区级代表性非遗目录。采取

瑶族文化“非遗”普查、加大文化建设投入、大力支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发挥引领作用等有效措施，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进社区活动，积极组织“非遗”项目参加各类展演活动，发扬光大瑶族文化“非遗”。三是瑶族文化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良性互动效果明显。以民俗旅游、康养旅游委着力点的瑶族民俗活动蓬勃兴起，以瑶妃为基本概念的地方特产、餐饮美食不断推出，瑶族特色民宿发展日臻完善，瑶族文化在旅游项目比重不断提高，支持致力于瑶族文化保护传承的文艺演出团队发展力度不断加大，群众自发性瑶族文化日益活跃，实现了瑶族文化活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统一。四是瑶族文化理论研究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走出去”步子加快，对外交流日趋频繁。以瑶族文化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图书资料、画册成果、歌舞晚会等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的研究成果达30余本(册)，《临贺长歌》《土瑶寨风情》等成为常态化歌舞活动，步头镇黄石瑶族服饰和富川“冬梅瑶绣”的首批200多件瑶绣产品成为了联合国赠送各国官员的礼品。

(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贺州瑶族文化再建构的机遇挑战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贺州瑶族文化的再建构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科技环境，同时也给瑶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调查中发现主要影响有：乡村振兴中基础设施改进加快瑶族传统生活方式改变；现代生活的同化改变了瑶族文化中的一些传统文化，逐步淡化甚或失传；乡村振兴中人居环境的改善，一些传统的瑶族村寨难以完整保留下来，特别是集体搬迁使得瑶族文化中传统习俗、文化仪式难以很好地维系。据调查，贺州土瑶中传统的树皮板房整村都是的，仅有沙田镇狮东村的大冲片区，因整片密集的不多，旅游开发难度大，这对于保护土瑶传统居住和打造有关旅游项目来说，成为无可奈何的一大遗憾。不仅如此，当前贺州瑶族文化再建构还与乡村全面振兴、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一

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瑶族文化再建构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没有站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瑶族文化再建构的重要性、必要性，对其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认识还不够到位。正是如此，一些地方瑶族乡镇的乡镇综合文化站被占用或闲置，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楼，用于瑶族文化发展的财政预算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二是瑶族文化再建构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途径有待进一步拓展。由于保护意识不足，保护的规划不够到位，一些具有瑶族文化特征的古民居和村落被现代化建筑严重侵蚀，一些村寨建设同质化严重，瑶族风格不突出。充分利用瑶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不够清晰，不够明朗，发展模式单一，路子不广，与周边的省市瑶族文化产业发展相比总体滞后。三是瑶族文化再建构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队伍有待进一步加强。由于缺乏相应的培养、引进和帮扶政策和奖励机制，两者彼此协同发展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力量薄弱，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文化创意人才严重匮乏，瑶族文化传承人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四是瑶族文化再建构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创新。两者协同发展运行机制不健全，瑶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力度不大、层次低，瑶族文化传承保护与乡村全面振兴难以深度、有机融合，瑶族文化再建构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叠加、倍增效应难以充分释放。

（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贺州瑶族文化再建构的主要内容

乡村振兴战略中瑶族文化再建构，应着重把握好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注重特色民居，即传统民俗的空间建构。在充分了解和认识瑶族古民居、古建筑本身建筑特色的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等多重价值，将其风格、彩色、材质、艺术等精华部分进行吸收改良，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并融入现代先进技术和方法，运用“建新仿古”的原则使之焕然一新。二是注重传统服饰，即瑶族文化的视觉建构。针对瑶族服饰的实用功能有所减弱的现实，在改良布料、款式、

花边使之更舒适、方便的同时，用现实场景展现瑶服的制作过程，甚或让观众参与到瑶服制作简单工序中来。三是注重传统美食，即瑶族文化的味觉建构。强化对瑶族饮食文化资源的媒体宣传力度、宣传促销，建设一批瑶族特色的饮食城或美食广场，开设“瑶家美食自助餐厅”，加大对瑶族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扩大瑶族饮食文化规模和品牌效应。与此同时，在让人们品尝瑶家美食的同时，也可参与其中的制作，以增强对瑶族美食的体悟。四是注重瑶族歌舞，即民族文化的视听觉建构。建立瑶族歌舞保护传承常态化机制，采取强化瑶族歌舞传承人培育，充分发挥中小学校、社区等阵地教唱、学跳瑶族歌舞作用，加强瑶族经典歌舞作品与现代歌舞元素的融合，进行艺术再创造，以及现代视听手段运用，提升其科技含量，强化瑶族歌舞舞台阵地建设，创造更加优美的舞台环境，提升瑶族歌舞吸引力等措施办法，做好瑶族歌舞的传承发展工作。五是注重医药康养，即瑶族文化的商品化建构。抓住贺州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康养首选地的政策机遇，针对瑶医瑶药资源萎缩、传承困难、后继无人的难题，在强化其调查摸底、记录，整理编纂成册存档的同时，通过扩种濒临消失的草药，开设一批瑶药批发市场，设立一批瑶医药膳堂、瑶医特色诊所和瑶族专科医院，放宽瑶医执业限制等多方施策，加强瑶族医药康养的商品化建构，将瑶族医药康养打造成贺州康养产业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六是注重岁时节庆，即民俗文化的集中建构。瑶族文化的重塑要抓住文旅大融合的时代机遇，以村镇、村屯为载体，对瑶族的重要节庆活动，采取复兴、移植、改良、创造等方式，予以集中全面的改良创新，让民众在欣赏和体验中感受瑶族民俗文化的风采。

（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贺州瑶族文化再建构的总体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贺州瑶族文化再建构，不仅是为了留住瑶族文化的历史，而是在着眼于继承保护瑶族优秀文化传统，促进瑶族聚居区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上，进行瑶族文化的创新，推

动瑶族文化高质量发展。这就迫切需要从瑶族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以全新的战略眼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高起点谋划好瑶族文化再建构的内容形式、体制机制、遵循原则和发展图景等总体性设计。指导思想上,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新理念。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中的指导地位,打牢瑶族文化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的文化根基,使之再建构沿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前进。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着力解决好瑶族文化再建构内在动力、整体效应、和谐相处、内外联动、公平正义的问题,为瑶族文化发展繁荣提供不竭动力、价值引领、优渥环境和保障支撑。遵循原则上,要立足瑶族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考虑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水平和目标,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协同、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等基本原则。要坚持保护为先,依法传承发展,合理开发;坚持机制制度创新,注重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坚持以“人”为核心、人民为中心思想,以文化人、以文惠人;坚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依靠先进技术;坚持以“形”为基础,以“乡”为本,以“俗”为重点,以“活”为目标,守正创新,提升向心力、吸引力和持续力;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发展愿景上,除了上文所述的要全面把握的六大主要内容外,要突出重点,在更加注重提升瑶族文化的精神价值、引领价值,保护利用瑶族文化遗产,完善瑶族现代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量和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造瑶族文化产业规模、品牌、特色效应等发力,促进瑶族地区乡村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以满足好瑶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求。

三、瑶族文化重塑助推瑶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对策建议

以瑶族文化重塑,助推瑶族聚居地区乡村振兴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瑶族文化与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即两者的结合性、互动性和耦合性问题。为此,应在两者协同发展的路径优化、保障支撑、机制创新等方面着力,强化两者互动,提高耦合度,形成最大化耦合效应。

(一)摸清家底,夯实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基石

乡村振兴背景下,以瑶族文化重塑,彰显瑶族文化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有多少的瑶族文化可利用?要让潜在的瑶族文化资源使用起来,让未发现的瑶族文化资源识别出来,这就要求做好瑶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工作。为此,要摸清家底,做好瑶族文化的普查、建档等基础性工作,对其进行一次全面而系统的大普查、大整理,使之能了然于胸。通过深入开展瑶族文化遗产普查登记、调查摸底、清点篇目等精准识别工作,查清其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空间、保护传承等基本情况,把散落的原生态文化挖掘出来,甄别好,并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手段,建立系统全面的档案和数据库,以保障其永续可用;要做好瑶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的中长期工作整体性规划,明确瑶族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目标、重点和步骤,细化瑶族民俗文化包装、打造、展示和推广的具体措施,夯实好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

(二)解放思想,增强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意识

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解决贫困问题与传统文化消亡之间的矛盾一直客观存在着。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强调的是既要解决好瑶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问题,又要保留瑶族文化的原有传统文化,并加以开发利用,达成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相统一。但现实中,由于对两者协同发展的意识不足,受那种保持原汁原味瑶族传统文化,越原始越好,不能改进、再创造的思想束缚,使得两者协同发展的叠加、倍增效应难以充

分释放。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强化两者协同发展意识宣传教育,破除思想障碍,摒弃僵化陈旧观念。针对对瑶族文化再创造认识上的不足,特别是对其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认识模糊不清、淡薄,宣传教育力度不足、针对性和持续性不强等问题,要充分借助各类新闻媒体,利用好博物馆、文化馆、网络等各种载体平台,加大宣传教育,开展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的教育引导,增进对瑶族文化保护传承、开发利用的基本知识、基本要求等认知,提高对两者协同发展的认同、认可,促进瑶族文化资源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承,在与乡村振兴互动双赢中创新性发展。

(三)把握规律,提升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效能

瑶族文化重塑既是瑶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点手段,又是瑶族地区文化振兴的目标、结果,需要对瑶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要掌握规律,突出重点,分门别类,差异实施,需要科学安排,聚焦重点,找准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五大振兴的结合点、突破口,以提高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效应。一方面,要注重突出瑶族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做到统筹考虑,突出地方民族特色,绝不能贪图表面功夫,急功近利、哗众取宠,忽视瑶族文化参与、建构,着力优化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路径,尽可能避免瑶族文化再建构中的资源浪费和破坏。要进一步加强瑶族文化阵地、平台建设,提高阵地、平台建设质量,将其打造为瑶族文化品牌,充分展示瑶族文化悠久历史和深厚人文内涵。要把握好瑶族文化重塑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提高瑶族文化重塑与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的共融度。另一方面,要立足长远,以价值为导向,强化瑶族文化中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歌舞文化、医药文化、生态文化与乡村振兴的结合;要突出瑶族群众主体地位,尊重瑶族群众发展需求,调动瑶族群众保护传承、开发利用本民族的资源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着力培育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

同发展持续的内在动力。

(四)创新机制,强化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保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4]。为此,要创新机制,着力建构科学管用、运行高效的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制度体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支撑。一是强化组织保障。坚持党对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领导,强化瑶族地区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对瑶族文化重塑的认识,将瑶族文化重塑工作纳入瑶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绩效考评指标,建立健全责任明确、协调有效的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工作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使之沿着正确方向稳妥有序推进。二是强化制度保障。充分汲取《贺州市黄姚古镇保护条例》立法经验和执行实践探索经验,推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立法,制定繁荣瑶族文化事业的政策措施办法,确保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三是强化投入保障。建立瑶族文化专项资金,将瑶族文化重塑经费纳入各级政府预算,鼓励民间社会资本对瑶族文化重塑进行投资和资助,多渠道、多途径地为瑶族文化重塑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筹措资金,保障两者协同常态化发展。四是强化人才保障。通过发挥学校教育阵地作用、建立瑶族文化传承基地等举措,着力加强兼具文化保护、乡村振兴能力的人才队伍建设,锻造一支关注关心瑶族文化传承保护、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专业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 [1] 中央代表团五分团到贺州市慰问考察引起干部群众热烈反响[N]. 2018-12-15 (01).
- [2]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求是,2019(11):3-17.
- [3]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6(01).
-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01).

责任编辑:鲍跃华

社会主义学院语境中的“中华文化”属性剖释

龚万达

摘要:对社会主义学院语境中的“中华文化”的属性进行了剖释。无论是“文化”还是“中华文化”,其首要属性是其意识形态属性。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文化意识形态属性的认识是一脉相承、始终如一的。社会主义学院应以中共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为导向,“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政治共识,做好中华文化工作。

关键词: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属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62-05

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1](以下简称《条例》)。《条例》专设第六章,具体规定了社会主义学院的中华文化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工作,该章共包括四条,即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为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开展中华文化的相关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尤其是在第一章“总则”中的第五条“社会主义学院基本任务”中,把“组织开展中华文化的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作为五项基本任务之一。而2003年11月由中央统战部制定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暂行条例》,只是在第三章“班次和学制”中的第二十四条,对社会主义学院的中华文化工作进行了规定。这充分说明,在新时代,中华文化工作在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中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繁重了。但是,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实践中,因为涉及“文化”,有些同志就想当然地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说书唱戏

……”等等具体的文艺形式与社会主义学院的中华文化工作挂起钩来,甚至在两者之间划等号,而对社会主义学院的中华文化工作的属性实质上是什么并不清晰。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学院语境中的“中华文化”的属性进行剖释。属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2]

一、“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属性

每个时代都有代表该时代的文化。新时代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共十九大报告的第七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是这样论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三

收稿日期:2020-05-16

作者简介:龚万达,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博士。

位一体、不可割裂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明中期以前，中国既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经哺育了汉代雄风，盛唐气象。由于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未断裂。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评价儒家思想时曾说：“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4]儒家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儒家思想受到的责难和批判渐趋激烈，相应的配套制度也面临瓦解。

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六位清朝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从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清廷废除科举制，新式学堂不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学校不教，考试不考，行政系统录用出自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同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程度的加深、农村革命运动的兴起加速了农村宗族势力的垮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失去了制度性支持。再加上“五四”之后对“孔家店”的长期批判，到了今天，儒家核心价值观大多在非政治性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层面尚有遗存。这与基督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存在完全不同。西方主要国家早已实现政教分离，但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并未随之大幅度衰减，因为基督教身后的教会和教堂等组织系统仍然存在，为之提供制度性支持。

所以近代中国在面临民族存亡危机之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指导的任务已经不能由中华文化单独担负了。因此，中国的革命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走向复兴。马克思主义由于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而更具中国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生发的文化母体。孕育和成长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革命文化，是坚定理

想信念的优秀基因和强大原动力。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最大优势。

中共十九大报告的第七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共由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分别是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文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放在第一位，而且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5]第二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这些都说明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十九大报告第七部分的第四个方面和第五个方面分别论述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才涉及具体的文学艺术（简称“文艺”）和文化的发展问题。即便是在这两个部分也是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6]也是在强调其意识形态属性。

就具体的文艺工作而言，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要求的。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召开过两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第一次是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并发表讲话，阐明了文艺的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时隔72年，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党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7]充分说明，文艺的最重要属性是其意识形态性。

艺术具有意识形态性早已有定论。“社会的意

意识形态有艺术、道德、政治法律思想、宗教、哲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它包括了社会意识诸形式的绝大部分。”“在阶级社会中，艺术是一定阶级和一定社会势力思想、意愿和情感的反映。”^[6]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时，马克思恩格斯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来总括作为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自觉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在新时代，无论是“文化”还是“中华文化”，其首要属性是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也即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属性。

二、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对文化意识形态属性的定位一脉相承

在 1940 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了全面阐述。毛泽东首先阐述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特别是观念形态的文化，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又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7]663-664}

毛泽东其次阐述了文化革命是总的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所谓总的革命过程主要是指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协调进行的过程。毛泽东说，“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7]699} 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倡导的革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7]704} 二是批判封建文化、半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7]695}

而邓小平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有过深刻的论述。他在 1941 年 5 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的报告中开门见山的说：“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无

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8]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他在 1980 年《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9]1983 年 10 月，小平同志又对文化工作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强调说：“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0]

江泽民同志则把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上升到政党思想旗帜的高度：“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11]“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12]“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13]尤其是江泽民同志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三个代表”之一。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极端重视。

胡锦涛同志同样高度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14]要“始终高扬引导中国社会前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旗帜，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才能……有力地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对我国社会的渗透和侵蚀。”^[15]“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16]以上论述充分说明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也充分说明，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文化属性的认识是一脉相承、始终如一的。

三、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学院语境中“中华文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

我们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三位一体、不可割裂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学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其“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活动”更是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割裂。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从第四十条到第四十三条规定了社会主义学院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活动的属性。

《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经批准可以加挂中华文化学院和地方中华文化学院牌子，开展以爱国主义为宗旨，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活动。

第四十一条主要是规定社会主义学院面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民族、宗教界等人士开展国情教育和中华文化研修分类施策的具体教育目的。对港澳同胞是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对台湾同胞是争取台湾民心认同，对海外侨胞是促进海外侨心凝聚。面向民族、宗教界等人士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培训是为了进行文化引领，以文化认同增进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第四十二条是对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研究工作作出规定，指明社会主义学院的中华文化研究是为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支持。

第四十三条则是针对社会主义学院的对外交流活动作出规定。要求社会主义学院在对外的中华文化交流活动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助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在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应有作用。”

从以上对《条例》第四十条到第四十三条的分析可以看出，《条例》关于中华文化的四条规定分别涉及了这样一些词汇，“爱国主义、国家意识、爱国精神、民心认同、侨心凝聚、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论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基本方略即“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中所具体阐述的问题。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

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不是艺术院校，不能把社会主义学院的“中华文化”等同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说书唱戏……”等具体的文艺形式。政治学院应该坚持“政治”属性，也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当代中华文化发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割裂开来。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习近平强调，“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国人民奋斗圆梦、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不久前，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要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18]习总书记再次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在一起强调。

“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活动”不是把具体的文艺形式呈现出来就自然而然发挥政治教育作用了。社会主义学院在开设有关中华文化的课程、发起有关中华文化的活动、产出有关中华文化的产品时，应该按照总书记所说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展工作。这就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论”，通过目的明确的主动灌输，达到社会主义学院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凝聚共识的教育目的。具体的文艺形式只是灌输的中介和手段。

马克思在考察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程时，感到德国的无产阶级深切地渴望用先进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因此主张“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9]“思想的闪电击中无产阶级”是意识形态灌输论的最初表达。真正对灌输论进行系统阐述的是列宁，其相关论述集中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他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20]

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早在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20] 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八个相统一”的教学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21]

因此，社会主义学院要以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为导向，开设有关中华文化的课程、举办各类中华文化活动和产出中华文化的产品。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政治共识。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N].人民日报，2018-12-26(1).
- [2]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3054.
-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 [4]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 [5]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 [6] 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365-367.
- [7]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
- [9]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6.
- [10]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
- [11]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7.
- [12]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8.
- [13]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
- [14]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1(1).
- [15] 胡锦涛.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J].求是，2004(1).
- [16] 胡锦涛.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7.
- [17]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1).
- [18] 习近平在陕西考察[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4-24(2).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18.
- [20] 列宁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7.
- [21]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1).

责任编辑：宋好

梁漱溟“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季良琴

摘要:“以道德代宗教”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中西文化最初都经历了宗教与文化相互交织的状态,但在后来的发展演绎中,中国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文化信仰,而西方文化则是以宗教信仰为中心。尽管中西文化信仰不同,但在引人“向上迁善”,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都是相通的,正因如此,才赢得了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美好局面。本文是在准确理解把握“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中西文化同质化要素和共识基点,从中汲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智慧。

关键词:道德;宗教;向上迁善;共融互通;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67-06

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梁漱溟作为现代儒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文化思想对理解中西文化关系有着积极而深刻的启迪意义。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具有和西方宗教文化相同的向上迁善、维护社会有序发展的功能,并由此分析中西文化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当下,不妨重新审视梁漱溟“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同质化功能,从中找寻不同文明共融互通、协同合作的共识基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支撑。

一、“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的提出

(一)文化之初需要宗教

梁漱溟通过对比中西文化的异同,来分析中

国传统文化本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2],中西文化在本源上具有相似性。文化是对生存、生活状态的反映,马克思说“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过程、季节更替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转变为它的宗教”^[3],因此,文化的产生和宗教的产生都与人类最初的生活状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二者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早期人类的生存和认知能力十分有限,个体生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外界环境,这种依赖,既表现为对生存条件的被动接受,又表现为心灵皈依的向外诉求。“因那时人类对于自然环境,一切不明白;由于不明白,亦就不能控制;……而情志逐日在惶怖不安之中。同时,其只能有极幼稚之迷信,极低等之宗教,亦是

收稿日期:2020-05-10

作者简介:季良琴,中共泰州市委党校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美德伦理学,党的理论与党的建设。

当然的”^[4]。可见，早期文化反映了人类艰辛蒙昧的生存状态，而宗教则是对这种状态下的生存需求和未知恐惧的回应，所以说，人类早期复杂艰辛的生存环境既孕育了文化，也萌发了宗教，文化和宗教相互交织。正因如此，梁漱溟提出中西文明几乎都经历了“文化初期之需要宗教”的历程。这是“以道德代宗教”思想提出的现实依据。

（二）中西文化的分殊

“文化初期之需要宗教”是中西文化的共同特点，也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共同选择。随着人类生存能力和认知水平的提升，文化与宗教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在中国，自周孔以来倡导“敬鬼神而远之”，宗教与文化逐渐分道扬镳；在西方，宗教与文化依然相依相伴、相互交织，宗教成为文化的主导。如前所述，宗教是对生存之需和未知恐惧的回应，那么在中国，与宗教分离后的文化又是何以为继呢？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以家庭伦理关系为纽带构建起一套良性运行的秩序规范，以保证人类生存、生活的正常进行；以血缘亲情为依托，形成对家庭或家族的情感依恋和个体担当进取意识。由血缘亲情推演开来，以有序的社会组织形式，保障人类生存需求供给，以血脉亲情安抚恐惧的心灵，文化信仰由此形成。相比之下，西方宗教文化信仰是各种原始神秘的神祇，而中国传统信仰的基础则是人与生俱来的家庭伦理关系。

在梁漱溟看来，造成中西文化分殊的原因在于对待宗教的不同态度。“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5]。诚然，在中国，自周孔以来注重礼俗教化，倡导“敬鬼神而远之”，宗教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抽离出去，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礼俗教化，日益成为主导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且影响至今。在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宗教一直都与人们的生活相伴相生，不管是最初的“有多少城邦就有多

少信奉的神”的多神宗教时代，还是后来单一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宗教的时期，宗教对文化的影响丝毫不曾减弱。尽管中西文化对待宗教的态度出现了分歧，但二者在维护社会组织秩序运行，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方面，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从当今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现存状态便可以得到验证。这是“以道德代宗教”思想提出的历史基础。

（三）“以道德代宗教”的提出

“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6]。文化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但最终都要体现在构建社会组织秩序、推动社会发展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自周孔以来“古宗教之蜕化为礼乐，古宗法之蜕化为伦理”^[7]，“即此礼俗，便是后二千年中国文化的骨干，它规定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大体上一直没有变”^[8]，最终成为构建社会秩序规范的主要依据和主流价值观。而在西方，“虽然集团生活在西方巩固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但主要还是依赖教会的作用”^[9]，社会秩序的形成主要要依赖宗教。

中西文化，一个靠“礼俗教化”“伦理本位”，一个依赖神祇教义、训诫规约，二者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引领人类“向上迁善”，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勗勉情志、解释未知，成为西方人内心笃定的信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倡导“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修齐治平”，其核心价值理念自成一体，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百分之九十以上，怕都不在宗教组织”的“中国人的神情，总是从容不迫的”^[10]，而这种内心笃定、行为有序是源自儒家道德文化影响下的行为自觉，由此梁漱溟提出了“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这是“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内涵

宗教为何能够长期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马克思指出了宗教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这里所讲的“人民的鸦片”，不是毒品，而是药品，是

具有“麻醉、安慰和镇痛的功效”^[12]的药品，是能够在无情的世界里给人带来精神慰藉和温暖的药品。这就是宗教能够长期存在并且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关于宗教存在的理由，梁漱溟给出了如下分析：“（一）宗教必须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其事务；（二）宗教必须以对于人的知识方面之超外背反立其根据”^[13]。梁漱溟认为提供情感上的安慰勖勉和认知上的超验解释，是宗教能够存在的根本理由，这也是宗教的社会性本质。在梁漱溟看来宗教的上述社会之用，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那里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得以实现，由此他提出了“以道德代宗教”。

梁漱溟指出：“宗教之出现，即是为了人类情志不安而来”^[14]，宗教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安慰人类不安的情志，这也是宗教得以长期存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造成人类情志不安的主要原因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无限膨胀的求之不得，一个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慌。诚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情感，它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慰藉欲求、解释未知，这就是人类对宗教产生依赖和信仰的原因所在。而“近三千年而言”“中国文化内缺乏宗教”^[15]，人们的情感欲求和对未知世界的恐慌如何得以勖勉？对此，梁漱溟给出了他的见解：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道德“有宗教之用，无宗教之弊。”

（一）道德有宗教之用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注重情感，强调伦理秩序，以情感人、由伦而理，由此推演开来，以“推己及人”的体验方式慰藉情感，以“反求诸己”的内省方法探究未知，藉以内安于心，外立于行。

一是以“相与之情”勖勉情志。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人是最重情感的，“中国书所讲总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16]。因为重视情感，所以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和交往关系，这就是没有宗教慰藉的中国人能够得到情志勖勉的原因。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关系之人，一生下来便建立了他的第一社会

关系，即与哺养人之间的喂养关系，与此同时他对哺养他的人也产生了最初的依赖感。随着个体慢慢长大，他的交往关系不断扩展，情感也越来越丰富，而这一切都是从家庭开始。家庭是个人情感的基点，居于个人交往关系的中心，一切以家庭伦理为本位，这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立论基础，所有的情感铺展都围绕“什么是人”和“怎样成人”来展开。

什么是人？《中庸》有云：“仁者人也”。何谓仁者？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就是能够心里装着他、关爱他人的人。怎么爱人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敬父母是仁的根本。孟子也讲“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孝悌”、“亲亲”、“事亲”都是爱人的表现，是对“仁”的注解，而不管是如何注解，都离不开家庭、离不开血缘亲情，因此在儒家文化中如果离开了情感，再谈“什么是人”是没有意义的。儒家文化以家庭亲缘关系为核心，但又不限于血缘亲情。“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由家庭的亲缘关系推己及人扩展开来，由此构建起一套运行有序的社会组织规范，这就是儒家文化所蕴含的主流价值观。所以梁漱溟说“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17]。儒家文化重视情感，注重在交往过程中维系情感，因为要维系情感，便有了由情而发的伦理规范、道德秩序，又因为严格遵守维系情感的规范秩序，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情感。“君臣有义、师徒有情、朋友有信、东伙相诚、邻里相亲，”^[18]“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19]，人的情感在相互交往和维系中得到慰藉和升华。由此情循此理，因此理厚此情，情理相通，人方可为人。在阐释“什么是人”、“怎样成人”的逻辑里，人的情感勖勉不是向外寻求，而是在相互交往中自然而然地生成。

这就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区别所在。西方宗教

文化主要依托所信奉的神灵来消除不安，慰藉内心，情感勘勉向外求得。在中国儒家文化里，情志勘勉则是通过自然而然的情感自觉来实现的。比如父慈子孝，父母养育子女享受天伦之乐，子女接受父母抚育的同时享受父慈母爱，这种遵循伦理的过程，也是满足情感、安慰情志的过程。并且这种情义自觉不是外力使然，而是个体的主观内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由情及理，于己是自省，于人是为善，由此构建起组织规范和道德秩序。不管是自觉自律还是恪守训诫，“宗教和道德二者，对于个人，都是要人向上迁善”，在劝人向善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梁漱溟提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有宗教之用”。

二是以“向上之心”探求未知。儒家文化主张通过自省慎思来实现至善至美，如“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等等，这些都传递出“向上迁善”的价值理念。自省是分析总结过往，慎思是科学预判未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知荣辱、明是非、悟方法。可以说，儒家文化不仅在思想层面上为我们提供了以血缘亲情为核心的信仰价值体系，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为我们提供了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方法指导，赋予我们向上探求未知的信心和能力。

（二）道德无宗教之弊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不仅“有宗教之用”，还有“无宗教之弊”的利好，在他看来，道德与宗教之间有两个最主要的区别。一是引人向善的依赖路径不同。“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20]。道德是靠个体的自觉自律来完成，而宗教则要通过教规教义的训诫规约来实现。也就是说道德是行为主体凭借自力的自觉行动，而宗教虽然并未彻底放弃自力，但自力是通过他力（譬如宗教的教规教义）对个体产生影响发挥

效用，虽然最终还是依靠人自身发挥作用，但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宗教“比道德多一个弯”。二是引人向善的融合广度不同。儒家文化提倡的道德之善，源于亲情始于家庭，只要有家庭关系存在，道德便有了适用的对象和范围，从这一层面说，道德之善适用于一切家庭。而西方宗教文化所倡导的宗教之善，“其范围超于家族，亦不依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21]。表面上看“超出于家族”的宗教之善适用范围更广，事实上，由于不同宗教派系所信奉的神祇教义戒律不同，相互排斥甚至相互冲突屡见不鲜，而不同宗教之间的排斥冲突模糊了生命本初的联系，进而在信仰层面摧毁了生命联系的共识基点，因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大。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家庭伦理本位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以客观存在的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点，更容易得到认可与接受。由此，梁漱溟提出了道德“有宗教之用，无宗教之弊”。

三、“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的启示

中西文化，一个恪守家庭伦理，一个信奉宗教戒律，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频繁，交流合作的前提是打破隔膜，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摆在人类面前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全球性问题和风险将进一步加剧。经验告诉我们，化解此类风险挑战的最佳选择是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准确认识、理解“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从中找寻达成人类相融共识的基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精神智慧。

（一）“以道德代宗教”蕴含了凝聚共识的智慧

一是蕴含目标追求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凝聚理念共识，如果缺乏认识上的共识，任何形式的交流交往协同合作都将失去支撑、难以维继。自古以来，向善向上、安定和谐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识。“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实际上强调了，中国儒家文化具有西方宗教文化同样的迁善向上、维护社会秩序的功效。可见，中西文化在价值目标追

求上是相同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不管国别、种族、制度,在追求善意、积极向上方面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推动了人类社会共同向前发展。所以说,“以道德代宗教”思想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在目标追求层面的共识。

二是蕴含责任意识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世界各国同心协力,共创美好未来。纵观当下,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化,一方面,世界各国联系和交往更加密切,相互之间休戚与共,彼此相依;另一方面,人类面临的风险挑战不断增多,各种风险带来的“蝴蝶效应”更加明显,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道德代宗教”思想所倡导的“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22],以亲缘关系和伦理秩序为纽带把“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每个个体都是情(相与之情)理(伦理义务)与共的结合体,整个社会则是情理与共结合体的集合。不论种族信仰、国别制度,都有维护家庭关系、亲子传承的义务,这种相与之情也是一种伦理义务和责任担当。由“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举社会各种关系而悉伦理化之,亦即家庭化之”^[23],其责任意识也由家庭推及整个社会,这里我们看到了“以道德代宗教”所蕴含的安危与共、守望相助的责任担当。

三是蕴含理念善意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彰显普惠善意。人类因命运共同而成为一体,在命运面前,人类无需分出伯仲,也不必在意输赢,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秉持普惠的正义和善意。“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儒家文化倡导的“仁爱”理念,这种“反求诸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家国一体”、“天下大同”的仁爱观念,主张通过个体反思内省、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的正义和至善。这种反思自省、推己及人的移情体验不是某些个体和群体的专属,而是所有独立个体都能够作出的

反应,一切都在个体的体验和感悟之中,也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道德代宗教”思想传达了中西价值理念的普惠善意。

(二)“以道德代宗教”彰显出开放包容的格局

一是彰显亲诚互融的气度。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延续,都离不开特定文化和文明,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相互区别、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多样性。不能否认,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隔膜甚至是对抗冲突,比如“宗教纷争、族群对立、文化冲突”等,这些隔膜冲突人为地造成了世界格局的分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追求,因而包容互鉴、消除隔阂、化解冲突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以道德代宗教”意在强调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具有相同的社会之用,“以道德代宗教”不是唯我独尊的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以亲诚互融的心态看待中西文化的相似性。这种以亲诚互融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的气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路借鉴。

二是彰显求同存异的智慧。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世界各国紧密相连交织成网,任何一个点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全网尽毁。2020年发生的新冠病毒疫情再次表明,在人类灾难面前,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独善其身,袖手旁观、隔岸观火最后只能是引火烧身,搁置争议、摒弃对抗、携手共同应对才是明智之举。“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24]。“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并没有忽略中西文化的区别与差异,“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但是道德之所以能够代宗教是因为搁置了两种文化的差异,突出了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其实质是肯定了中西文明能够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达成共同的目的。而这正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荣损与共、同舟共济,求同存异

应对人类共同风险挑战应有的姿态。

(三)“以道德代宗教”表明了中国文化立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超越种族、文化、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线，共同思考人类美好未来发展方案。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关切之举，体现出一个大国的担当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斥某一种文明为前提”，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主导或主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化所秉持的立场。儒家文化崇尚“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并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于情谊之上”^[25]，家人父子相亲以情，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再比照处理其他社会关系，便可以实现“天下大同”。这种基于个体情感体验推演比照处理社会关系的处事逻辑，不仅使个体情感得以安慰勉，还是整个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支撑。而情感与每一个生命个体是相随相伴的，因而它是平等的存在，即个体获得情志慰藉具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性。有了这情志慰藉的平等性，“而此则把家庭父子兄弟的感情关系推到大社会上去，可说由内而外，就使得大社会亦从而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26]。这里可以感受到整个社会，平等气息充裕，没有高低贵贱，不分宗族信仰，睦邻友好的相处之道即刻呈现。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处理交往关系的智慧体现，也是当代中国所秉持的根本文化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27]。“以道德代宗教”出于感性又不失理性，道德可以替代宗教“引人向善”，推动人类社会前进，这种替代是平等友善的互助，不是颐指气使的逼迫。一切因平等而可用，又因平等而适用，道德与宗教可以并行不悖，平和相处，这正是当代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秉持的立场。因此，深入了解“以道德代宗教”丰富内涵，感悟其“引人向善”慰藉情志的价值真谛，领悟其独立平等的情感体验和价值立场，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话[EB/OL]. (2014-02-05).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402/25/20140225_2371661.shtml.
- [2][4][5][6][7][8][10][13][14][15][16][17][18][19][20][21][22][23][25][2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113,115,61,9,135,139 –140,104,115,115,120,149, 95, 95,126,83,95,223,138,139.
- [3][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8,2.
- [9] 杨泽波.道德代宗教:一个有意义话题的重提[J].河北学刊,2003,(3):57.
- [12] 李玲娟.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及当代价值[J].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7,(04):17.
- [27]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EB/OL]. (2019-04-30). http://news.cycl.com/xwzt/2019-04/30/content_18005876.htm.

责任编辑:宋好

庄子亲情伦理思想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

毛 笛

摘要:庄子亲情伦理思想包含“不可悬解”的真情论,“顺情守性”的无情说,以及“各得其所”的任情观与“群己和谐”的安情观。因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血脉相连的自然天性以及身份交叉带来的伦理错位等原因,亲情腐败成为家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境。庄子亲情伦理思想有异于传统的亲情伦理思想,可以帮助领导干部直面自然天性,消除腐败盲点;解放思想束缚,预防情感变局;明晰身份定位,坚守责任底线。

关键词:庄子;亲情伦理思想;领导干部;家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73-05

家风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家风建设在法制化的“硬件”方面,已卓有成效,但在伦理文化、思想道德的“软件”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入探索。庄子的亲情伦理思想有异于传统的家庭伦理思想,可以为当下家风建设提供文化伦理支撑,弥补法律制度之外的缺失,并与之相辅相成。

一、庄子亲情伦理思想的内涵

对于亲情伦理,《庄子》文本中有大量相关论述说明庄子有着与儒家相似相通的立场,即庄子同样注重亲情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只是对于亲情的具体实践有所不同,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可悬解”的真情论

“悬”是庄子经常在文中描述到的一种精神状态,《外物》提及:“有甚忧两陷而无所逃,蟬不得

成,心若悬于天地之间,慰晷沈屯。”林云铭对此解释道:“蠾蟬,虫起蛰而甦之貌,屈伸俱难也,故其心若悬空而不能自主。”^[1]即一种被束缚被牵制的状态,人会因为各种外界的事物或自身内心的欲望而被困住,如同被绳子绑住而悬浮于天地之间,身心不得安宁。庄子对于造成人陷于“悬”的状况的各种因素,如功名利禄、道德是非等,始终致力于将人从其中解放出来以达逍遥之境,这便是“解”。但是对于亲情,庄子却认为无法悬解,内篇《人间世》有云:“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对于其中的“命”林云铭注“其命相属,是以天和者。”^[2]指出在庄子心中亲子关系是自然固结,亲情源自人的自然天性,于内心之中根本无法消除,即无论是为人子者对于亲上的孝,还是亲上对于子女的爱,都是一种自然命定,特别是为人

收稿日期:2020-05-02

作者简介:毛笛,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庄子思想研究。

子者所对应的孝，为人子者从投身于世，存活于世，无论是发端对于父母精血的秉承，或是成人之前父母的养育与教化都是自身无从选择的，即使日后成人独立也难以撇清自身应该面对和承担的分位和牵绊，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所逃于天地间”。颇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庄子此段论述是借儒家圣人孔子之口说出，用以告诫叶公子高，可从侧面反映出庄子并不反对儒家一直以来对于亲情孝道的推行，并在《养生主》中将“养亲”与“保身”、“全生”、“尽年”一起作为养生悟道的终极目标，足见其对于亲情伦理的重视。但同时庄子天性谨慎，又借孔子之口将亲情作为“天下大戒”之一，引发人们的关注和警惕，庄子认为亲情虽无法悬解，但产生的伦理关系亦会引发诸多事端，需要引起人们的戒心。

（二）“顺情守性”的无情说

虽然庄子认为亲情是无法悬解的自然命定，但其并未如儒家一般着力为世人描绘“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理想天伦蓝图，甚至将其如何实践事无巨细地规定下来。庄子看到了这幅理性的天伦蓝图背后的隐患，正如其在《外物》中所说：“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已忧而曾参悲。”林云铭对此有注：“忠孝为君亲之所欲，亦不必信其爱。其中有数存焉。”^[3]即在亲情的双向互动关系中，孝与爱未必都是完美的对等关系，其中是有“变数”的，主体双方若有一方“失德”，便会打破另一方的心理平衡，陷入“孝未必爱”或是“爱未必孝”的紊乱关系中，失去心灵的平和，让悲痛忧伤的异化情绪充斥心中，影响自身或是他人。针对亲情互动中的“变数”庄子主张实践“无情”的用情原则，庄子的无情说源自其与惠施在《德充符》中的一段关于“情”的辩论：惠子询问庄子“人故无情乎？”，庄子回答：“然”。后世对于庄子逍遥无情的出世印象大多来源于此，但此中庄子所谓的无情并不是惠施理解的断情绝爱，而是“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无益生也。”即顺应情感的自然流动，不因“好恶”即过度的情感动荡而内伤其身，并且庄子亦有提到：“无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此中所谓之“情”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因成心而产生的异化情感，例如过度的忧愤、哀乐等，是心灵的负累，而因亲情互动失衡产生的情感动荡亦属于此范畴，会对人的身心产生伤害，因此庄子提出了“无情说”来保持人的本真以预防情感变局带来的伤害。

（三）“各得其所”的任情观与“群己和谐”的安情观

对于亲情的牵绊，庄子同样注重个体生命自主性、自觉性以及创造性，因而在庄子的情感世界里，对于亲情的具体实践，并不拘泥于世俗成心的束缚，类似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行为规范与其而言并不是必须固守的真理。外篇《骈拇》庄子有提出：“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即庄子认为当规矩、绳墨、仁义等已成为某种意义的标杆，便会成为负累，对“性者”、“德者”、“当然”有所妨害，最好的方法是任情，陈鼓应指出庄子的任情指向的是生命本真，其中有冲破世俗、顺人本性、个体力量的激发等多重含义。^[4]于庄子而言亲情虽是不可悬解的人生羁绊，但却不能成为束缚生命性情发展的阻碍，它的表达与处理亦需在顺应性情发展的情况下进行。庄子的任情观旨在树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高远人生观，实现万物各得其所的最终目的。同时庄子也非常注重群己关系，亲情的互动亦是群己关系的一种，庄子的安情观便是其与世俗共处的方法，意在引导人们如何在群己关系中安身立命，处理好群体行动中个体生命的发展，既能保有个体生命的特质又能兼容多元的生命面貌。对此庄子的具体实践方法是“忘”，“忘”是庄子的特殊用语，内外篇皆有提到。例如《大宗师》中提到的“忘仁义、忘礼乐”，其中的“忘”意为安适而不执滞，即在生活实践中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并不执着于任何一方，主张从自得、自定、无牵制的互动来体现真正的亲情伦理。

二、家风建设面临的亲情困境

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需要注意的方面很多，亲情腐败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无法避免的自然天性

鲁迅先生曾说过父母对于子女的爱是“自然界的安排”，是一种“天性”，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至可以牺牲自己成全后辈生命的长途发展。此种奉献无关任何利益纠葛，只是出于人类生命的本能。而子女对于父母亦有这方面的本能反应，如自然界中的“羔羊跪乳，乌鸦反哺”，亦是一种天然的习性，而非文明社会讲究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交替的结果。人类最原始的天性，使亲情成为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最为纯粹亦是最难割舍的情感羁绊。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特别是在抵抗腐败这条长远的道路上，“爱与孝”的自然天性则容易成为他们“人性堡垒”的弱点。领导干部亦是普通的人类个体，亦有本能的需要，但在“防腐”意识上，他们对最亲近的父母子女容易缺少戒心，甚至会出于本性盲目地信任和保护家人，而忽略了自身的责任与正气。

(二)传统文化形成的思想束缚。

分析中国特有的人伦文化，从《尚书》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孟子》五伦中的：“父子有亲，长幼有序”，亲情互动关系都是其中的重点人伦关系。但某些传统的伦理文化传播，存在一个“开端——异化——普化”的过程，最典型的便是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儒家伦理文化。原始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在强调伦理道德的同时，并未寂灭情的作用。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偏颇，特别是宋明时期在尊性黜情基础上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将情性分离以致塞绝人情，将原始儒家关怀人群的德性伦理，转化为干枯闭塞的‘概念木乃伊’”^[5]，使得原本缘情制礼、情礼兼顾的道德伦理产生异化，失去了血肉支撑，而之后更严重的是这种“以性禁情”的异化思想逐渐成为主流，禁锢人们的伦理思维。反应在亲情伦理上，便是子女需要不顾一切地“为孝而孝”，如若不从，便为异类；而父母则需将光宗耀祖，蒙阴子女视为理所当然的责任。面对这种衍化了上千年的亲情伦理观，领导干部容易被所谓的亲情伦理规范绑架，而失去自身的正气与原则。

(三)身份交叉带来的伦理错位

在实际生活中，领导干部身兼私人家庭与公共行政两种伦理角色。在公共领域，领导干部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公共权力的受托者，需要遵守行政伦理规范，即在公共权力与资源的行使和分配中遵循相应的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在私人领域，领导干部又是为人父母或是为人子女，基于自然天性的亲情爱意以及中国特有的孝道文化，会更加注重私人家族的发展，甚至竭尽所能地为父母子女或其他亲族提供帮扶，以达到族人兴旺、延续家族荣耀的目的。*J·S·奈曾*分析腐败的实质是出于“私人利益的考虑而偏离公共角色的正常义务，获取金钱或地位又或是因为其他私人影响而违背规则，使得公共资源不恰当地为私人利益所用”^[6]。而亲情腐败便是领导干部因为身份交叉，在生活实践中越过了行政伦理角色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与职业道德，让手中的职权为满足家庭伦理角色的义务而服务，此种行为又会因领导干部的公共伦理角色而被公众关注并且放大，不仅会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还会对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亲情腐败成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境。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亲情腐败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造成危害。2016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不少领导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累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7]

三、庄子亲情伦理观对家风建设的启示

(一)直面血脉天性，消除腐败盲点

亲人之间的情感互动出自人类的自然天性，本身没有是非对错。父母对于子女的宠爱、子女对于父母的孝敬，在一定意义上是值得褒扬的，但对于身负一定职责的领导干部来说，“孝与爱”的天性情感有时会蒙蔽他们的“防腐”意识。

庄子对于亲情伦理的看法比较全面。他认为

亲情是世人无法悬解的真情，无需“为解而解”，但同时又对亲情关系保持谨慎的态度。庄子视其亲情为“不可解于心”的“命”，并一再强调它是世人“不得已”和“无所逃”的自然羁绊。例如《外物》中提到：“孝未必爱，故孝已忧而曾参悲”，庄子认为曾参之孝在亲情的互动关系中实为一个负面例子。在“曾子耘瓜”的故事中，庄子谴责曾参只知一味地孝敬父母而伤害自身，因而用一个“悲”来总结他那令儒家称颂不已的孝行，但尽管如此庄子也只是表达了他对曾参行孝方式的不满，而从未建议或者劝说类似曾参之人完全放弃孝敬父母的举动。庄子深知亲情互动是人们原始的自然情感表达，即使给人带来羁绊也无需违背人性强制进行剔除。但同时庄子又将其作为“天下大戒”之一。戒，法也，《养生主》亦有“怵然为戒”之语，蕴含戒备警惕之意。庄子将亲情引以为戒，是因其看到了这种自然情感关系虽是自发产生，但其互动表达会与他人产生牵绊，这种牵绊是自身无法控制的。在一般的群己互动中，人心都会有所防备，但是面对血脉相连的亲人，亲情有时会让人丧失警惕之心，在亲情互动中若有一方失德，或是被他人利用而导致互动失衡，将会给毫无防备的另一方带来巨大的伤害，严重斫伤人的本真。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要解决当下家风建设中面临的亲情腐败问题，首先要做的便是全面认识亲情关系，在直面自然天性的同时警惕亲情互动中可能出现的偏差。领导干部与普通人一样都有自然情感互动的心理需求，但其职权在身又必须保持反腐意识。庄子关于亲情的真情论承认亲情是人类的自然牵绊，无法避免，可以帮助领导干部直面人的亲情互动需求，在生活中正常释放自我情感，无需过度避嫌；同时在工作中，领导干部应当警惕亲情互动带来的不良影响，消除防腐意识的盲点，谨慎对待潜在的腐败陷阱。

（二）解放思想束缚，预防情感变局

庄子对源自人类天性的亲情保持谨慎态度，是因为庄子认为亲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属于群己关系的范畴，存在变数。而当亲情的互动出现变

局，若还是坚持采用传统的伦理方式去解决，会危害人的身心。对此庄子提出了“无情说”，以预防情感变局带来的身心动荡，保持人的本真不受其影响。

如何在亲情变局中顺情守性而保持本真，庄子在《应帝王》中提出了“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的用心原则，即心如明镜，任万物往来而不加迎送，真实反映一切而不做任何保留，去接受、去顺应亲情互动中的变数，不执着相聚，不抗拒别离，不沉溺伤痛。对于传统文化中构建的类似光宗耀祖、子贵父荣等亲情伦理规范，庄子并不反对，认为可以在亲情互动平衡的状态下顺心而为，但当互动失衡，出现“父不慈子不孝”等亲情变局时，便无须违心压抑内心的忧悲，一味地愚孝或是慈爱。因为当变局出现时，若依然固守外界所谓的孝道人伦，会使忧愤郁结于心无法释放，长期如此会导致心灵动荡，身心都会被悲愤等负面情绪绑架，从而悬于天地之间无法解脱，“于是乎有嗌然而道尽”最终精神崩溃而玄理尽失，更甚至会落得如同孝己一般的悲惨下场。孝己，殷高宗之子。“殷高宗武丁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¹⁸孝己事亲至孝，然其父听信后妻谗言而将孝己流放至死，为避免此类后果庄子主张以“无情”来应对亲情互动失衡的局面，视变为常，打破儒家理想的天伦蓝图，将亲情互动的双向性呈现给世人，并帮助世人顺应情感的自然流动，不因过度的情感动荡伤及心灵和生命的自然平和。

一些领导干部在家风建设中出现亲情腐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异化传统伦理文化的浸染，并被由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伦理规范所绑架，而失去自身正气与原则。庄子的亲情伦理观注重亲情互动的双向性，强调亲情变局的可能性，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摆脱单向的事亲道德规范，同时引导领导干部的情感自然释放，预防亲情变局带来的心灵动荡。

（三）明晰身份定位，坚守责任底线

庄子非常注重万物的各得其所与个体生命的

自然发展,从内篇《大宗师》中“相濡以沫”的寓言故事可以得到印证,“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此则寓言被后世普遍用来指人与人之间的患难真情,比喻在困境之中,用微薄的力量互相帮助。庄子并不否认人们于困境之中培养起来的真挚情感,但相濡以沫的前提是“泉涸”,而“泉涸”实为一种隐喻,象征的是人们所处的一种不良的异化状态,并不是常态,因为“泉涸”所以才有鱼儿们以唾沫湿润彼此生存下来的举动,此种患难之中相互扶持的强烈情感的确让人感动,但却“不如相忘于江湖”,因为“相忘于江湖”才是万物各得其所的自然良好状态,可以让个体生命自由独立发展,激发更多的个人力量。同时庄子也没有忽视群己关系的重要性,庄子明白人存活于世,不可能不与他人接触互动,更何况是身边的至亲之人,只是庄子的事亲之道注重在亲情互动中保持安适而不执滞,也就是“忘”,如《天下》篇中有:“使亲忘我难……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其中将对父母的孝与个人以及天下的安适并列而谈,由此可见庄子理想中的亲情互动不仅要父母安适,自身安适也涉及天下人的安适,不能执滞于一方而忽略其他。

领导干部之所以会将公共角色与家庭角色混淆,利用职权之便为亲人谋取利益,在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亲情产生的自然牵绊让其潜意识里认为,血脉相连的亲人之间理应相互扶持,福祸相依,但却忽略了个体生命的独立自然发展才是世间常态。领导干部对于亲人的帮衬扶持,有可能让对方产生依赖而丧失独立自主的能力,更会葬送自身的发展前途,危害公共利益。庄子注重生命个体自然发展的任情论有利于领导干部在亲情互动关系中明晰身份定位,清除不必要的感情牵连。而兼顾亲人、自身、天下的安情说则能提醒领导干部自身的职责不仅限于家庭责任,尤其是主政一方的主要领导干部,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更要承担起相应的公共责任,坚守原则底线,不能顾此失彼。

参考文献:

- [1][2][3] 林云铭.庄子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96,46,296.
- [4][5] 陈鼓应.庄子论情:无情、任情与安情[J].哲学研究,2014(4).
- [6] 吴帅,杨文德.伦理错位下的“亲情腐败”及其预防[J].甘肃社会科学,2005(3).
- [7]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6(6).
- [8] 皇普谧.二十五史(第一册)[M].山东:齐鲁书社,2000:32.

责任编辑:宋好

浅谈“新冠”疫情影响下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曲 超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蔓延,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随着全球疫情的不断变化,一些矛盾日益凸显,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况也随之波动,这给在疫情下如何做好施工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结合某施工企业工作实际,提出用“复方云党课”提高政治免疫,用“防疫强心剂”提升心理素质,用“文化甘草片”疏导负面情绪,用“关怀及时雨”保障复工复产,筑牢广大职工的思想防线,全力以赴打赢防疫复工攻坚战。

关键词:“新冠”疫情;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78-03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1]大考之下,有效发挥施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作用,科学引导和服务广大职工筑牢思想防线、提升心理素质,是对施工企业党组织的重要考验,也是做好年度教育学习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和突破点。

一、“新冠”疫情背景下,影响施工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原因分析

一是集中开展教育学习不多。集中教育学习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作用,既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把党的精神传递到每一个职工,又便于沟通、交流,获得理想的教育学习效果,还能提高职工的组织观念和学习的严肃性。由于施工企

业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在疫情管控最紧张的时期,单位“进不去”、家里“出不来”,人员到岗率低,再加上疫情防控期间严格控制人员聚集,这些都给集中教育学习的开展带来了不便。

二是人文关怀重视程度不够。思想政治工作承担着解决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随着防疫工作的不断延伸和复工复产的持续推进,施工企业面临的防疫压力和生产压力越来越大,节奏变化越来越快,管理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上,对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更多时候是停留在概念上,没有结合实际落到实处。

三是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不足。疫情传播的不确定性、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网络垃圾的不可靠

收稿日期:2020-05-18

作者简介:曲超,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性,给广大职工心理健康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不足,会使职工身心得不到有效的调整,焦虑、恐慌、沮丧、无聊等不良情绪滋生和蔓延。比如有的职工担心自己会被传染,有的职工整天刷手机越看越焦虑,有的总是不由自主地通过网络去打探所谓“真相”和小道消息等等。

二、“新冠”疫情影响下,做好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一)预防先行,用“复方云党课”提高政治免疫

政治过硬,离不开理论的坚定。持之以恒地坚持政治理论学习,能够有效提高思想免疫力。疫情期间,许多职工居家办公或隔离办公,活动半径比较小,自我约束也随之降低。伴随着身体的放松,思想这根弦也有所松懈,加上网上良莠不齐的信息海量袭来,广大职工精神病毒的防疫也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施工企业必须重视疫情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丰富多样的“云党课”,及时发挥施工企业党组织的思想保障作用。首先,要扩大“云党课”的覆盖面。施工企业要制定行之有效的学习计划,除了要求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利用“学习强国”、“微信”、“钉钉”等APP参加规定的“云党课”外,还要面向全体职工开通党课直播平台,实行积分奖励,确保“云党课”传播半径的最大化,让党的好政策、好思想、好声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次,要提高“云党课”的趣味性。党课是否吸引人,主要看“云党课”的教学方式是否有趣。要将枯燥乏味的理论传授转变为趣味盎然的课堂演绎,这就给施工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党课有党味、有滋味,就要积极提升“云党课”的趣味性,既要讲“普通话”,又要说“方言”,才能让广大职工听得下去、听得进去。第三,要增强“云党课”的针对性。施工企业职工的教育背景较为多元,性格想法各有不同,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党课教育,也是施工企业党组织要充分思考的问题。要注重把复工复产、科学防疫等要素同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既要通俗易懂,还要立场鲜明,既要讲透“大道理”,又要说好“小故事”,让每个职工喜闻乐见,方能入脑

入心。

(二)因地制宜,用“防疫强心剂”提升心理素质

此次“新冠”疫情,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因此,巩固和提升广大职工的心理素质,是施工企业党组织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首先要强化战胜疫情的自信心。疫情面前,要教育广大职工充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要及时纠正个别职工因个别问题产生的错误认识,要引导职工从现实的防疫成果中,获得正确的认知体验,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强化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其次要强化复工复产的责任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认真教育引导广大职工学习在复工复产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让大家从身边人、眼前事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正能量。施工企业要通过线上线下广泛宣传,积极推送好人好事,结合复工复产发起线上话题,讨论向榜样“学什么”、“怎么学”,让大家时刻把“榜样看在眼里,把责任放在心头”。第三要强化科学理性的平常心。由于对疫情的认知不足,广大职工缺乏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施工企业党组织要主动作为,充分发挥阵地作用,在线上线下及时、准确地开展宣传,传播科学、权威的信息,教育引导广大职工做好心理调适,保持平常心,提高科学应对疫情的能力。

(三)就地取材,用“文化甘草片”疏导负面情绪

疫情期间,广大职工文化活动形式单一,但文化需求旺盛。施工企业要因地制宜、自给自足,本着“有趣有益、就地取材”的原则,积极开展寓教于乐、陶冶情操的文化活动,创造情感宣泄的平台,引导职工释放心理压力。首先依托“线上读书会”开展阅读分享。施工企业要善于用书香滋养、用阅读服务广大职工,发挥读书在职工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使广大职工在阅读中收获希望、感受美好。施工企业要结合热点开展线上沙龙读书活动,及时增加阅读的话题,提高大家的活跃度,让大家有读的方向,有读的动力,有读的伙伴,让好的图书如春风般扑面而来,让广大职工在“互联网里觅书香”。其次是举办“施工企业云展览”增强

职工自信。可以面向广大职工征集抗疫主题文艺作品,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单位宣传栏进行展示,内容涵盖书法、绘画、篆刻、诗歌等。为确保参与度和广泛性,施工企业党组织要“广而告之、主动出击、充分动员”,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丰富职工疫情期间的文化生活。第三是参与“电影 E 起看”陶冶道德情操。电影可以通过精彩的故事情节、鲜活的镜头语言、丰满的银幕人物,生动地传播社会正能量。疫情期间,施工企业党组织可以开展“电影 E 起看”活动,通过线上订阅和购买的方式,定期向职工进行“佳片推送”,也可以动员职工在微信群分享推荐优秀影片,让大家在经典影片的交流中,获得精神的陶冶。

(四)保障有力,用“关怀及时雨”助力复工复产

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能够有力保障教育深入人心。开展及时、精准、有效的人文关怀,对提升职工凝聚力、强化职工归属感、激发职工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首先,要“将心比心”开展“精准关怀”。疫情期间,精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将心比心,以职工的需求和期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尊重和体会职工在特殊时期的情绪和想法,把职工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把职工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只有站在职工的立场才能有的放矢,让职工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其次,要“了然于心”开展“及时关怀”。开展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最怕脱离实际,施工企业如果不能及时把握职工思想脉搏、掌握员工思想动态,就无法第一时间开展关怀服务。疫情期间,施工企业党组织要定期开展网络问卷和线上谈心,及时了解职工诉求,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对可能出现影响思想苗头的情况制定“菜单式”应

对方案,早发现、早关怀,满足不同职工的不同情况。第三,要“打动人心”开展“特殊关怀”。日前,全社会正在逐步有序复工复产,对于一些受疫情影响暂时无法复工的职工,施工企业党组织要怀着感情开展工作。可以定期进行“视频家访”,安排党员骨干“包干关怀”,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将微信群变成“关心群”,把视频会开成“暖心会”,用互联网编织“爱心网”,帮助他们疏导情绪,缓解焦虑,让他们时刻感受到来自组织的温度和力量。

习近平指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能不能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是对各级党组织、党员和干部的重大考验。^[2]对于施工企业党组织来说,认真做好疫情影响下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党旗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第一线高高飘扬,就是认真践行总书记要求的职责所在和使命担当。施工企业要一以贯之地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肩膀上,当好职工的贴心人,始终与职工同频共振,让思想政治工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使广大职工充分感受在疫情防控中彰显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参考文献:

- [1][2]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EB/OL].(2020-02-2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23/c_1125616016.htm.

责任编辑:宋好